2012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分 类 号：　　　　　　　　　　　　　　学校代码：10269

密　　级：　　　　　　　　　　　　　　学　　号：51092905012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DISSERTATION

论文题目：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研究

院　　系：政治学系

专　　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研究

指导教师：郝宇青　教授

论文作者：冯小伟

2012年4月

2012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学校代码：10269

学号：51092905012

華東師範大學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研究

院　　　系：政治学系

专　　　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研究

指导老师：郝宇青　教授

硕士研究生：冯小伟

2012 年 4 月完成

Paper of 2012 Grade of Master University Code：10269

Number：51092905012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on Political Jokes i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Brezhnev Period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rment

Specialty: Research on Socialism

Supervisor: Hao Yuqing Professor

Postgraduate: Feng Xiaowei

Completed in April,2012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郑重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研究》，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博士（请勾选）学位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冯小伟　　　　**日期：** 2012年 5 月 14 日

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研究》系本人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博士（请勾选）学位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归华东师范大学所有。本人同意华东师范大学根据相关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如国家图书馆和"知网"送交学位论文的印刷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数据库被查阅、借阅；同意学校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请勾选）

（ ）1. 经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部门审查核定的"内部"或"涉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导师签名 ______　　　　本人签名 冯小伟

2012 年 5 月 14 日

* "涉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或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需附获批的《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涉密"审批表》方为有效），未经上述部门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冯小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单位	备注
范军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主席
解超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张丽君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摘要

政治笑话是指与政治相关的笑话，具体地讲，政治笑话是指涉及政治体系的具有政治维度的笑话。它采用一种幽默与讽刺相结合的方式，从本质上讲，它属于“政治言论的符号空间里的边缘层”。政治笑话是一种口头表演艺术形式，其创作和传播的主体是普通民众，客体是政治体系，在自身发展中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政治笑话对政权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从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焦点、可接受性和表演方式等四个方面的结构分析标准来对其进行研究。

自苏联诞生以来直到它解体，苏联社会上便一直流传着讽刺其政权的政治笑话。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而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苏联政治笑话不仅数量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传播的速度日益加快，而且从不同层次讽刺了苏联政权的方方面面。从目标对象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存在着三大层次，即政治人物层次、制度性层次和社会生活层次。各大层次中又包含着具体的一些目标对象。笔者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进行归类和分析的基础上，然后通过焦点分析方法剖析出这些政治笑话所反映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导致的社会后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大量滋生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第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停滞社会”客观上为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主题。第二，苏联事实上实行的“指导性政治参与”为政治笑话这种存在着“一定危险性”的政治言论行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第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众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消极认可为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提供了合理性。

笔者通过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后，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在那个“停滞社会”里，苏联民众曾经对苏联体制进行过怎样的思考，对苏联政权抱什么样的心态以及民众到底知道些什么。这可以使我们从苏联民众的角度来更好地看待苏联体制、客观地剖析苏联体制。

关键词： 政治笑话 勃列日涅夫时期 政治人物层次 制度性层次 社会生活层次

ABSTRACT

Political jokes are involved in politics. Specifically, political jokes are jokes of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y use a combination of humor and irony, in essence, they belong to the edge of the layer in the symbolic space of political speech . Political jokes are a verbal form of performing arts.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political jokes are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object of political jokes is the political system.They show som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artistic approach in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jokes of the regime is a "double-edged sword" ,from the target object and the focus and the accep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styles to study them.

From the birth of the Soviet Union to its collapse, political jokes have been circulating in soviet socity in order to ridicule the regim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viet political jokes has gone through two phases, especially it got to the heyday during the Brezhnev period. During the Brezhnev period, not only the number of Soveit political jokes occupied a large proportion ,but also their spreading speed was becoming faster more faster.They ridiculed all aspects of the Soviet regime from different levels.From the target object's point of view, Soviet political jokes involve three levels, that is , the level of political figures, the level of the system and the level of the social life. Every major level also contains the specific target objects.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arget objects of Soviet political jokes during the Brezhnev period, author gets ready to analysis the drawbacks of the Soviet system which political jokes reflect through the analysis method of the focu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oviet political jokes has a profound soci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Brezhnev period. First, the stagnant society objectively provides a lot of them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political jokes during the Brezhnev period. Second, the guidanc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emerge of Soviet political jokes in the Soviet Union. Third, the negative recognition of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people provides the reasonablenes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political jokes during the Brezhnev perio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jokes of the Brezhnev period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how the Soviet people have been thought of the Soviet system, how they held the mentality, and what they knew about the Soviet regime in the stagnant society.

This can make us a better view of the Sovie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viet people, and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Soviet system.

KEY WORD: Political Jokes; the Brezhnev's Period; the Level of Political Figures; the Level of the System; the Level of the Social Life

目录

绪论

（一）选题意义

政治笑话是指与政治相关的笑话，具体地讲，政治笑话是指涉及政治体系的具有政治维度的笑话。它采用一种幽默与讽刺相结合的方式，从本质上讲，它属于“政治言论的符号空间里的边缘层”[1]。

自苏联诞生以来直到它解体，苏联社会上便一直流传着讽刺其政权的政治笑话。苏联政治笑话不仅数量非常多，其语言特别尖酸、犀利；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各个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感器”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突显出来。尤其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特别极端，二是苏联开始步入停滞和衰退的社会状态，这导致苏联政治笑话像山洪般爆发出来，使这种影响政治体系的“微弱却普遍的”、“持有异议的”、“隐蔽的、不公开的抗议形式”[2]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变成“政治抗议”的一种特殊形式。现在看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与其是讲笑话，毋宁说是历史”[3]。正如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科夫斯基[4]所说：一个苏联笑话抵得上汗牛充栋的政治论文。因此，笔者觉得从政治笑话这种特殊的历史材料来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体制是非常有新意和有意思的。从苏联政治笑话的独特视角来剖析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弊端以及所导致的社会状况，这使得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与社会的离异程度。客观上这也有益于为我国在处理国家与社会矛盾方面提供了参照，使我国不断地完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妥善地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二）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而且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全面。但从苏联政治笑话这一视角来研究苏联问题、特别是苏联体制方面

---

[1] Elena Sheygal-Placzek,The World of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Anekdot,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Nos. 3/4 (Summer/Fall 2009),pp.234-249,236.

[2] Ben Lewis:Hammer &tickle,Prospect Magazine,20th May 2006—Issue 122.

[3]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卞德清、林笳等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 页。

[4] 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科夫斯基（1942—），苏联作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神经生理学家，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创始人之一。

是非常少的,更不用说用该视角来单独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体制日益暴露的弊端和严重后果。

在国内，我国学者在苏联政治笑话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本身就不足。中苏关系恶化时期，国内倒是涌现出了一些关于苏联政治笑话的小册子。比如，南开大学东风红卫兵数学战斗队编写的《在苏联人民中间流传的一些政治笑话•选编》（1966),《上海公社》编辑部出版的小册子《流传在苏联街头的政治笑话》(1967)，上海市长阳中学教工革命造反大队翻印的《在苏联流传的政治笑话》(1967)，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编辑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1975)，等等。而从我国改革开放直至 90 年代初，国内流传的苏联政治笑话越来越少，最常见的来源主要是一些内部报纸，比如《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等。这时期关于苏联政治笑话方面的书籍、资料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两三本专门关于国外政治笑话的书籍，而且都涉及了一些苏联的政治笑话，分别是沈欣编辑的《西方政治笑话》(1989)，穆然和赵仁等老师编辑的《中外政治笑话精粹》(1993）一书。另外一本则是专门整理俄罗斯笑话的《俄罗斯笑话与幽默》(2004)，其中“政治笑话”一章收录了苏联时期的许多经典政治笑话。从总体上看，国内关于苏联政治笑话的资料一是非常少，二是比较零散。另外，目前我国国内还没有人从学术性角度来对苏联政治笑话进行一定的分析和研究。

在国外，无论在苏联政治笑话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还是从学术性角度对苏联政治笑话进行一定的分析和研究，国外学者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就苏联政治笑话资料方面来说,国外对其收集和整理还是比较丰富和全面的。比如,Bruce Adams 的“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David Brandenberger 的“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Mark Perakh 的“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Juri Viikberg 的“Anecdotes about Soviet Power and Their Leaders:Collected from Estonia 1960-1986”(2003)；Kadi Sarv 的“Childrens’ Political Anecdotes-Register”(1997);Nikolai Zlobin 的“Humor as Political Protest”(1996)。这些都是最近出版和发表的关于苏联政治笑话较为全面、系统的著作。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国外学者还从学术性角度对苏联政治笑话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例如，Ben Lewis 的文章“hammer and

Tickle"（2006）以及"Hammer & Tickle: A History of Communism Told Through Communist Jokes"（2009）一书从历史角度出发把苏联政治笑话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Christie Davies 的"Humour and Protest:Jokes under Communism"（2007）和"Jokes As The Truth About Soviet Socialism"（2010）这两篇学术论文对苏联政治笑话的历史重要性以及政治意义做了一定的分析，但较为简略；Arvo Krikmannd 的"Jokes in Soviet Estonia"一文把赫鲁晓夫时期以来苏联政治笑话在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发展过程做了概括性的研究；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塞斯•贝内特•格雷厄姆（Seth Benedict Graham）的博士论文"A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kdot"，更是从词源学和文化角度探讨了苏联的政治笑话现象。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目前学者对苏联政治笑话这一主题还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尽管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笑话开始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基本上还是仅侧重于苏联政治笑话的资料整理和历史发展过程，并没有把苏联政治笑话与苏联体制联系起来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更没有单独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进行相关的研究。因此，笔者将对苏联政治笑话的研究定格为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鼎盛时期"，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笑话，把该时期苏联的政治笑话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通过政治笑话来剖析出当时苏联体制的缺陷在社会中的暴露。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首先，笔者从政治笑话的学理研究入手，在第一章中探讨一下政治笑话的含义和四层要义，以及政治笑话的四个结构分析方法和政治功能，为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其次，笔者在第二章中从历史角度出发对苏联政治笑话的历史发展过程做一个简述，梳理一下苏联政治笑话在词源学上的发展以及界定苏联政治笑话的内涵和外延。通过政治笑话的四个结构分析标准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笑话的发展过程以及突出表现进行阐述。具体地讲，笔者首先采用目标对象分析方法和焦点分析方法阐述一下苏联政治笑话在两个发展阶段中目标对象及其焦点的发展和扩大；然后采用表演方式分析方法对苏联政治笑话在两个发展阶段的表演氛围进行对比分析；再通过可接受性分析方法剖析一下苏联政治笑话在两个发展阶段中民众和官方各自对待苏联政治笑话的态度，尤其突出官方在苏联政治笑话两个发

展阶段中的态度、采取的政策及其后果。

再次，笔者采用目标对象分析方法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分为三大层次：政治人物层次、制度性层次和社会生活层次。各大层次中又包含一些具体的目标对象。例如，政治人物层次中具体包含着勃列日涅夫、列宁、恰巴耶夫和施季里茨四个目标对象；制度性层次中具体包含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对外政策三个目标对象；社会生活层次中包含着勃列日涅夫遇刺事件、莫斯科奥运会、贝阿铁路三个重大事件，以及政治口号、移民和外逃现象、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盗窃、酗酒、偷听外国电台信息等社会问题，这些都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具体目标对象。然后笔者再采用焦点分析方法对各个层次中的具体目标对象进行分析，剖析出各个目标对象所突出的苏联体制中存在缺陷和弊端以及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例如，在制度性层次中，关于政治体制的苏联政治笑话其焦点主要是突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干部体制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人唯亲的任命制和特权制度这个三个弊端；关于经济体制的苏联政治笑话其焦点主要是突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行政指令性经济政策和短缺经济这两方面的缺陷和弊端；关于对外政策的政治笑话其焦点主要是突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采取的缓和之下的对外扩张和争霸政策。

最后，笔者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停滞社会”的突出表现和后果、政治参与以及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滋生的社会土壤。

综上所述，本文笔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在已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结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采用历史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文献资料研究法，以及政治笑话的四个结构分析方法等，将苏联政治笑话这一特殊的“历史文献”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体制联系起来进行相对客观的研究。

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学者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的基本历史面貌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随着苏联历史档案和东欧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再加上国外学者从政治笑话这一角度对苏联进行了有一定成效的研究。这都为本人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进行研究提供了切实的可行性。

第一章 政治笑话概述

第一节 政治笑话的含义

一、政治笑话的含义界定

政治幽默是普遍人性的内容之一，自有政治以来，政治笑话便应运而生。在人类的政治文明长河中，政治笑话是一种反映政治生活的社会现象。但政治笑话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一种影响政治体系的“微弱却普遍的”、“持有异议的形式”和较为“隐蔽的、不公开的抗议形式”[1]，尤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政治抗议”的一种特殊形式，只能是近现代政治社会的产物。“在以往的时代里，人们信奉‘君权神授’，国家政权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神。对统治者的批评，就是对神的亵渎，应该受到诅咒。”[2]当然，这并意味着在古代没有政治笑话，只不过大多数只能算得上“官场笑话”，对由按照神意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不敢进行愚弄的。

政治笑话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幽默或政治讽刺的口头作品形式之一，其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该时期的政治体系。所谓政治笑话是指与政治相关的笑话，具体地讲，政治笑话是指涉及政治体系的具有政治维度的笑话。它采用一种幽默与讽刺相结合的方式，从本质上讲，它属于“政治言论的符号空间里的边缘层”[3]。

二、政治笑话的四层要义

1、政治笑话的创作和传播主体是普通民众

这里的普通民众是指一般民众，包括专业的艺术表演家，但排除扮演职业政治行为角色的活动者，即政治领导人和一般官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人和一般官员不讲政治笑话。事实上，很多国家领导人特别喜欢听和讲政治笑话，比如中国的毛泽东和美国的克林顿都很喜欢讲政治笑话，甚至连斯大林也喜欢听政治笑话。如果职业政治行为者是在作为社会的一般角色来听或讲政治笑话的情况下，也属于政治笑话创作或传播的主体。否则这就失去了对政治笑话与政治体系

[1] Ben Lewis:Hammer &tickle,Prospect Magazine,20th May 2006—Issue 122.

[2]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卜德清、林笳等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3 页。

[3] Elena Sheygal-Placzek,The World of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Anekdot,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Nos. 3/4 (Summer/Fall 2009),pp.234-249,236.

之间关系的研究意义。另外一点，充当政治笑话创作和传播主体的民众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政治笑话是不可能确定创作者，更不用说确定听众，其创作和传播的政治笑话都是“集体创作的产品”[1]。

2、政治笑话的客体是政治体系

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政治笑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达对政治现状的不满，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意传感器”把民众与政治体系联系起来，甚至成为一种消极的“政治抗议”形式试图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和调整，以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改善和分配。而决定大众利益的改善和分配的是政治体系的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则。其中，既包括，政治体系的人事选择，也包括政治体系的各种提取、管制和分配活动；既包括政府的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则，也包括政党和其他政治团体的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则。

3、政治笑话具有自己的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政治笑话同其他类型的笑话一样，是一种口头表演的艺术形式。专门编写的以供人阅读的政治笑话是极少的，至于关于很多政治笑话的书籍其首要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供人阅读，而主要是为了对政治笑话进行搜集和整理，以便从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真实性的证据”进行某个方面的相关研究。这一方面体现出了笑话的共性，即从创作到传播都是口头性的。除此之外，政治笑话具有一些与其他类型笑话不同的特征。第一，一些政治笑话往往具有固定的套式。“原本是个空洞的外形，随时可以装进一个新的内容，多数这类笑话模式简单，能够使用不同的政治体制。”[2]比如，讽刺某位领导人的笑话可以套用于其他领导人身上。第二，政治笑话传播的效率高、速度快。某个新的政治笑话一旦出现，便以极快的速度在人群之中传播起来。在特定的年代里，政治笑话往往成为了解当前社会、政治真实状况以及领导人的特殊方式，充当政治信息传播的非官方媒介。第三，政治笑话往往是特定的政治事件的反应。在某一时期，当一件政治事件出现时，在社会里便会很快流传着与该政治事件相关的笑话。该类政治笑话通常反映了该政治事件的真实内容或人们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社会看法和评价。第

---

[1] Christie Davies：Humour and Protest: Jokes under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007), 52:pp.291-305,291.

[2]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卞德清、林笳等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四，政治笑话具有“时效性”。“政治笑话通常具有短暂的生命”，[1]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绝大多数政治笑话都需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才具有幽默感，很多政治笑话现在读起来很枯燥、乏味，并不具有讽刺、幽默的效果，有些甚至根本无法理解其意思，就是因为没有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甚至具体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进行理解。第五，政治笑话的采用形式具有多样性。比如，采用双关语、谐音、模仿或诙谐的改编标语、讽刺诗、三段式以及问答式等形式。

4、政治笑话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手法

“大多数政治笑话利用幽默的方式抨击当权者或政治现实，通过夸张和诙谐奚落国家及其代表人物。”[2]

幽默出自人的智慧，引人发笑。“幽默是社会文明进化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形式，是艺术化的语言，也是一种艺术技法。”[3]用幽默表现笑话，“其形式微笑而感人至深”，使笑话“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微型文学形式”。[4]“幽默的性质，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方法，其特点是曲折、含蓄，俗话就是拐着弯的说法；不用直叙，而是令人思而得之，是使人领悟的语言方法。”[5]日本学者长谷川如是闲[6]认为幽默属于“社会性的笑”。我国学者方成把幽默的精髓归纳为“奇巧”：“奇是出乎意料的，是由主观想法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造成；巧是其中又有合情理之处，也就是在矛盾之中，还有协调之处。”[7]笑话要达到幽默的效果，一是在于抓住社会中的不协调之处进行曲折、含蓄地表达；二是“靠说者和听者双方默契中达成，使听着感到话里有机巧的安排”。[8]

讽刺是一种“带有情绪的”艺术手法，通俗地讲，讽刺就是对对象进行嘲笑、讥讽、奚落、讥笑的意思。“讽刺意在批判和谴责，含有明显的贬意，抒发轻蔑和愠怒之情。”[9]一般来讲，幽默中含有讽刺的意味，讽刺中也带有幽默，“讽刺是以幽默为手段揭示矛盾，进行暴露和批评的。”[10]“讽刺和幽默是人们表达思想

---

[1] Nikolai Zlobin,:Humor as Political Protest,Demokratizatsiya,4(1996),pp.223—231,223.

[2]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卞德清、林笳等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3] 方成：《幽默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页。

[4]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5]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6] 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日本评论家、作家。

[7] 方成：《幽默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5页。

[8]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9]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10]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情感的独特方式，奇巧则是这种独特方式的主要特色。”[1]当民众发现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不合理、不道德的现象时，便会感到不满和厌恶，甚至是愤怒，从而在心里对其进行评价或表明态度，“讽刺就是表态的一种艺术方式。这种艺术方式的特点是奇巧地使对方处于十分尴尬以致狼狈不堪的境地。”[2]

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幽默和讽刺这两种艺术手法是相互包含的，“讽刺艺术的特点是鲜明地、强烈地反映事物的矛盾。那就必须设法使矛盾突显出来。夸张就是人们惯用的显示矛盾和突出矛盾的方法。”[3] “夸张幅度越大，越能取得大出意料的奇巧效果。”[4]夸张的艺术手法也常借助比喻、曲折、含蓄等技法来突出其对象。

第二节 政治笑话的结构分析和政治功能

一、政治笑话的结构分析

政治笑话针对政权的方方面面，不仅反映出政权的表面现象，而且很多反映出该政权的本质。虽然政治笑话是以一种口头表演形式流传在社会中，但笔者认为可以从目标对象、焦点、可接受性和表演方式等四个方面的结构分析方法[5]对政治笑话进行分析和研究。

1、目标对象分析

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是政治体系。美国戴维·L·帕雷兹教授认为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从高到低可分为五个层次：领导人及其他官员；领导人颁布的政策；职位；国家机构；作为整体的政治体系，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6]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层次越高，这表明民众对政权越不满，甚至对政权失去了信任，政治笑话对政权越具有“破坏力”。在民主制国家，大多数政治笑话一般针对较低层次的目标对象，尤其是领导人及一般官员，这主要是由于民众对他们身心上的缺陷或癖好具有“好奇心”。但在集权国家，政治笑话针对的对象具有

---

[1]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2]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3]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4] 方成：《红旗下的幽默——从笑话到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5] 美国戴维•L•帕雷兹教授在“Political Humor and Authority: From Support to Subversion”一文中从目标对象、焦点、可接受性和表演方式等四个方面的结构分析方法来对政治笑话进行研究。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了戴维•L•帕雷兹教授关于政治笑话的四个结构分析方法，但对各个分析方法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一定的补充。
[6] David L. Paletz,Political Humor and Authority: From Support to Subversi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October 1990 ,vol. 11,no. 4 pp.483-493,485.

各个层次，甚至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讽刺，比如纳粹时期的德国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东欧各国。

2、焦点分析

所谓政治笑话的焦点，指的是政治笑话对所针对的目标对象要强调、突出的方面或特点。简单地说，该则政治笑话从什么方面或角度来讽刺、嘲弄对象。焦点是政治笑话的核心组成部分，往往明确了对象的实质内容或人们对该对象抱什么态度或看法。因为政治笑话是一种口头表演艺术形式，而且大多都采用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因此它的焦点往往具有含蓄性、一定程度上的"隐蔽性"。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对政治笑话的理解需要结合该对象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民众心态，只有这样，政治笑话的焦点才能凸现出来，从而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各个层次对象的焦点是相当丰富的。就领导人及其他官员这个层次对象来讲，大多数政治笑话往往强调领导人或其他官员身心上的特征、人格、癖好，以及他们的政绩。就政治职位层次来讲，政治笑话往往会对其运作和实际社会效果进行评价。就国家制度这个层次来讲，政治笑话往往会针对国家机构及其制度的缺陷和实际功能进行嘲弄和讽刺。在集权国家，一些特殊的国家机关部门往往成为政治笑话讽刺的主题。比如，纳粹时期德国的盖世太保、苏联的克格勃，政治笑话经常强调、突出其神秘和残忍性。

3、可接受性分析

政治笑话的可接受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民众对政治笑话的可接受性；二是国家政权对政治笑话的可接受性。民众作为政治笑话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其政治笑话本身就是体现民众对政权的看法和感受，再加上政治笑话的特殊幽默性，因此政治笑话往往在民众心中具有很高的可接受性。政治笑话越具有生命力，这越表明民众对该对象的看法具有"集体认同感"。另一方面，就政权方面来讲，政权作为受批评的对象，对政治笑话肯定抱着谨慎的态度，甚至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在集权国家，当局往往会采取"镇压"政策。

4、表演方式分析

政治笑话的表演分析是多方面的。就一则政治笑话而讲，其表演分析包括采用形式——双关语、三段式、问答式、模仿或诙谐的改变标语等，艺术手法——讽刺、幽默和夸张等，当时的场景，讲笑话者的肢体语言，讲者与听众之间的感染力，讲政治笑话的气氛和社会氛围，等等。政治笑话要在民众中引起共鸣和幽

默感，离不开其表演方面的运用技巧。一则政治笑话如果采用恰当、合适的表演技巧，更加有利于政治笑话在民众中的传播，从而引起更大范围内民众的“集体认同感”和感染力，使政治笑话在社会中更具有影响力。

二、政治笑话的政治功能

政治笑话作为一种“沟通策略”，反映出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不满”情绪。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材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文献，“与其是讲笑话，毋宁说是历史”。[1]政治笑话是民众对日常生活中政治现象最基本、最有效的“回应方式”[2]，有着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政权的影响上。

政治笑话的政治功能表现在具有矛盾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笑话对政权起着“安全阀”的作用。政治笑话对政权是无害的，很多政治笑话只是民众对政权不满的一种“情绪性”发泄，有利于缓解民众与政权“直接冲突的紧张程度”，[3]“成为直接的肢体冲突或军事冲突的代替品”，[4]“可以延缓政权的存在”[5]。政治笑话的大量出现也表明了民众对政权的“无奈”，对所存在时局的消极认可，“人们希望改变命运，从暴政下得到解放，但是这个想法没有唤起行动去反抗”，[6]“说到底，谁也无法改变现实中的弊端”，[7]“政治笑话成为民众心理上逃避社会会现实的表现”[8]。而另一方面是政治笑话对政权起着“破坏性”的作用。政治笑话本身就是对政权的一种政治批评，民众对政权的不满以政治笑话的形式大量堆积于社会中，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一股集体力量威胁着政权存在的合法性，破坏着政权的权威。尤其是在集权国家，其社会功能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政治笑话具有“积极的鼓动和宣传的价值”，[9]成为一种特殊的消极的“政治抗议”形式，是一种“微弱的武器”，有时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甚至成为社会的“微

[1]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卞德清、林笳等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 Nilsen, Don L. F.: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Political Humor,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Winter90, Vol. 24 Issue 3, pp.35-47.35.

[3] David L. Paletz:Political Humor and Authority: From Support to Subversi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October 1990 ,vol. 11,no. 4 pp.483-493,484.

[4] Nilsen, Don L. F.: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Political Humor,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Winter90, Vol. 24 Issue 3, pp.35-47.35.

[5] David L. Paletz:Political Humor and Authority: From Support to Subversi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October 1990 ,vol. 11,no. 4 pp.483-493,484.

[6]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卞德清、林笳等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7]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卞德清、林笳等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8] Antonin J. Obrdlik:“Gallows Humor”: A Sociological Phenomen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5:5(1942),pp.709-716,710.

[9] Graham,Seth Benedict: 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cdote,PhD thesis,U. of Pittsburgh,2003,p7.

弱的革命”。“政治笑话破坏了民众对政权的服从意识，以致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起来推翻政权。”[1]

在笔者看来，上述政治笑话这两方面的功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政治笑话对政权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当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流传着大量的政治笑话时，实际上已经表明民众对政权的不满，也说明该政权已经开始失去民心，其存在的“稳定性”也开始动摇，而大量的政治笑话以讽刺、幽默的形式发泄出民众的不满，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缓解民众对政权进行直接对抗的程度，从而客观上延缓了政权的存在，也可以给政权一种“警告”，使其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来应对各种问题；但同时，政治笑话作为一种政治讽刺现象长期存在于该社会中，由于其独特性会使民众更加对政权失去信心，成为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抗议，使政权逐步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政权的崩溃，从这一点上讲，政治笑话就算得上一场“微弱的革命”。

[1] Graham,Seth Benedict：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cdote,PhD thesis,U. of Pittsburgh,2003,p7.

第二章 苏联政治笑话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政治笑话的内涵在俄（苏）历史中的流变

在俄语中，anekdot（pl:anekdoty）一词专门指轶事或趣闻，是于 18 世纪中叶由法文 l'anecdote 一词引进而来，而最早源于希腊文 anekdotos[ανέκδοτος]（pl:anekdota[ανέκδοτα]），其字面意思是“未发表的，未公开的”。6 世纪拜占廷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1]在自己的著作中首次使用了这一词。作者当时并没有给自己的那本著作命名，在其生前也没有公开发表，其所记录的内容以谣传和传说的形式流传在当时的社会中，直到他死后一千多年即 1623 年才由罗马教皇的图书馆员阿列曼尼在拜占廷帝国的图书馆里发现，被命名为《秘史》。《秘史》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丑闻录，不经装饰地、甚至是粗俗地描述查士丁尼一世滥用权力、性格上的缺点以及身体上的厌恶等方面。《秘史》是对查士丁尼时代宫廷黑暗生活的揭露，对拜占廷广大人民在其统治下所遭受的灾难的真实描绘。这样一部最初的 anekdota 形式的作品所采取的特点——私人地、未公开发表地、直接批评地、历史性地描述及揭露其政权——为具有政治内涵的笑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 20 世纪以前，俄文（anekdot（pl:anekdoty）一词同英语中的 anecdote（pl:anecdotes）一词的意思基本相同，是指“轶事、趣闻，关于真人真事的短小且有趣的故事”。[2]在社会上流传的 anekdot 基本上都是关于俄国历史人物的有根据的叙述性的风闻趣事。正如 Elena Sheygal-Placzek 教授所分析的，“早期的 anekdoty 都是描述国家领导人的样貌、性格、习惯、行为及其言论等方面令人好奇的事迹。”[3]1840 年《俄语同义词词典》对 anekdot 的解释是“揭露出政治事务和历史文献的秘密或展现出事件被隐藏起来的最真实的一面的故事”。[4]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anekdot 的含义已经扩展到包括富有幽默的民间传说。Anekdot 一词发展到 20 世纪初，其基本含义同英语中的 joke 一词相同：“一种带有非常幽默

---

[1] 普罗科匹阿斯(约公元 500—565)，拜占廷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属于古代晚期世俗史学家。
[2]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 56 页。
[3] Elena Sheygal-Placzek,The World of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Anekdot,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Nos. 3/4 (Summer/Fall 2009),pp.234-249,234.
[4]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 Pegasus,NY, August 26, 2009,p28.

的故事或对话的创作的口头艺术产品。”[1]自 20 世纪早期以来，anekdot 具有了新的含义，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明出来的通过口头传播的“其目的是嘲弄、讽刺人或事的具有娱乐性的故事”[2]，具有虚构的、俗套的、没有出处的特点，它们倾向于“打破禁忌”[3]。

早在 19 世纪中叶，俄国的民俗学家便开始对本国的 anekdot 进行相关的分析和分类，把 anekdot 作为民间故事的一个子类别。随后，俄国学者将 anekdot 定性为日常生活的故事，是俄国民间故事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类别，而不同于恐怖故事和动物故事。Anekdot 特别强调“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行为”，“俄国的文化和社会关系在 anekdot 的发展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对 anekdot 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4]

到 20 世纪中叶，苏联官方将政治笑话定性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在社会危机的时候具有煽动性的功能”。[5]后来，按照《苏联刑法典》的相关规定将其认定为一种“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的政治言论行为，具有“反苏”的性质。从苏联官方对政治笑话的看法及其界定表明，苏联政治笑话是“未被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大众文化，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真实心态和对国家的各项工作和事业的真实看法，与官方的主流文化相悖，往往“打破禁忌”。因此，在苏联时期，流传于社会上的政治笑话是一种口头艺术形式，不存在公开出版的书籍及其作品，其创作和传播都是经过民众较为隐蔽的口头讲述来形成的，被人们称之谓“地下笑话”。笔者在此要说明一点，在苏联时期也存在着极少数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民间幽默讽刺期刊——“Krokodil”、“ Prozhektor”和“Zanoza”等。例如，“Krokodil”（中文译为“鳄鱼”）创刊于 1922 年，1966 年开辟名为“Just an Anekdot”的专栏发表具有政治讽刺性的笑话或轶事以及漫画。1971 年该栏被更名为“Smiles of different latitudes”，每期含有“2～18 个笑话”，主要是讽刺资本主义国家和具有“反苏”性质的各种政治、民族、宗教团体，有时也有关于国内政治事件或社会生活的讽刺内容，但重点是“国外生活”。[6]这种少数存

---

[1] Graham,Seth Benedict：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cdote,PhD thesis,U. of Pittsburgh,2003,p1.

[2] Viacheslav B. Kashkin and Ksenia M. Shilikhina:Narrat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tereotypes:Discursive Functions of Russian Anekdots,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2,Nos.3/4(Summer/Fall 2009),pp.250-266,251.

[3] Graham,Seth Benedict：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cdote,PhD thesis,U. of Pittsburgh,2003,p1.

[4] Graham,Seth Benedict：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cdote,PhD thesis,U. of Pittsburgh,2003,p32.

[5]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 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Bloomington,Indiana,2009,p15.

[6] Vadim V.Dementyev:Russian Anekdots of 1970s:On The Material of The Soviet Humorous Journal ‘Krokodil’,

在的“书面形式”的政治幽默作品实际上属于苏联官方的政治幽默，不属于笔者所研究和分析的苏联政治笑话的范围。

据以上分析，笔者给苏联政治笑话的内涵作一个定义。苏联政治笑话是指苏联民众采用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对苏联政权及其领导人进行嘲弄和表明民众社会心态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具有政治维度的口头文化作品，具有讽刺性、私下传播的较为隐蔽性以及集体认同感的特点。其目标对象涉及苏联政权的方方面面，既包括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也包括苏联的各项工作和事务，即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还包括苏联党、政等机构的领导人及一般工作人员。

第二节 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阶段

苏联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曾谈到：“书报检查的压力和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有一点好处，它们迫使你学会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想。”[1]苏联政治笑话的产生和发展也是这样，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苏联消失，政治笑话便作为一种广泛的、独特的言论形式出现在社会中，讲政治笑话已经成为苏联城镇民众日常交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2]民众在每天的交谈中都会涉及类似这样的话题：“你知道这个笑话吗”。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1917 年——1953 年、1953 年——1991 年。

一、1917 年——1953 年

1917 年——1953 年是苏联政治笑话的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具体分为两个时期：

1、1917 年——1929 年

在苏联十月革命、内战时期（1917 年——1921 年），很少有相关的政治笑话出现。下面一则该时期的政治笑话可以很好地说明那个时代民众对刚刚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感受：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2,Nos.3/4(Summer/Fall 2009),pp.185-198, 186,187.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张达楠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93 页。

[2] Elena Shmeleva and Alexei Shmelev:Evolution of A Speech Genre:The Case of Russian Canned Jokes (Anekdoty),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2,Nos.3/4(Summer/Fall 2009),pp.171-184,172.

一位老农夫去参观莫斯科动物园，当她第一次看到一匹骆驼时，她说道："天呐，你看看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这匹马做了什么。"[1]

到斯大林时期，社会上开始流传了一些描述十月革命、内战时期那几年国家所发生的急剧变化的政治笑话，不过，这些政治笑话都是"以相当模糊、隐晦的语句来讲述"[2]的。现存最早的几则政治笑话主要是讽刺那些年代为党服务的人员的残忍和愚蠢，尤其是 "契卡"的工作人员（笑话①、②）。苏联政治笑话在 20 年代已经把焦点指向了苏联短缺经济的现状——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短缺（笑话③、④）。较为有意思的是，苏联政治笑话有相当的份额是由犹太人发明的笑话，其主人公经常是拉比诺维奇（Rabinovich,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往往体现了犹太人较高的智慧水平）。这时期犹太人创造的一些政治笑话充分体现出犹太人在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时期的重大作用（笑话⑤）。"据统计，当时在 556 名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中有 448 名是犹太人，占 80%以上。"[3]

①在十月革命后，上帝派了圣卢克、圣乔治和摩西三个观察员到苏俄，他们三个都给上帝发来电报。
"我已经落入契卡手中了，圣卢克。"
"我已经落入契卡手中了，圣乔治。"
"一切都好。人民政治委员摩西。"[4]

②两个警察在查一位过路人的证件。那位过路人只找到了一张尿检分析报告。
第一个警察大声地读到："报告分析：蛋白，负；糖，负。"
第二个警察说道："没有糖。这说明他不是投机分子。走吧，公民。"[5]

③一个男人到家后，兴奋地向他的妻子报告，"我已经入党了！"
"你这人总是对什么事情都好奇。你有鞋子穿吗？"[6]

④人民委员给莫斯科下了一条命令：由于燃料短缺，所有的温度计都应该被设置成

[1]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4.
[2]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29.
[3] 唐裕生：《前苏联的反犹政策与犹太移民潮》【J】，《世界民族》1995 年第 1 期，第 42 页。
[4]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4.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

比正常温度高四度。[1]

⑤“党里有多少犹太人？”
“没多少，大约 60%。”
“那剩下的是？”
“犹太妇女。”[2]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 年——1929 年），苏联政治笑话对过去近十年来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独特的描述和思考。一些人开始思考与十月革命前有什么不同，对社会主义存在着困惑，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笑话中便有所体现（笑话①、②）。在这一时期，关于苏联政权对待宗教及教会的问题、工农监察队的人员滥用和官僚化表现，关于共产国际以及推行世界革命的问题，甚至列宁去世后官方对列宁的相关宣传和口号，普通民众对这些事件的了解和评价，都以政治笑话的口头艺术形式体现了出来。

①我们进行革命就是为了实现 2%的增长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开始生产 42 度的伏特加，比沙俄时期伏特加的酒精度高 2 度）[3]

②一位党员努力地向一位老妇人解释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他说道：“那时候将有一切，事物，衣服，各种商品，你还可以出国旅游。”
“哦，明白了，跟沙皇时代一样。”[4]

总体来讲，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是非常少的，但从目标对象分析和焦点分析来看，1917 年——1929 年期间苏（俄）联政权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及其影响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在为数不同的政治笑话中体现了出来。

2、1929 年——1953 年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苏联政治笑话才逐渐成为城市民众日常生活中颇受喜欢的话题。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斯大林时期是这一阶段（1917 年～1953 年）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关键时期。

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笑话实际上是苏联民众从幽默、讽刺的角度来描述“斯大

[1]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7.
[2]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31.
[3]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6.
[4]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6.

林体制”。这一时期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国家急剧的工业化；内务部及其工作人员；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官方宣传的政治口号及其手段。其焦点所突出的主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农业全面集体化政策所导致的集体农庄庄员工作效率低下，以及出现的粮食短缺、贫穷和大饥荒；急剧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管理上的官僚化和劣质的产品，以及片面注重重工业、国防工业而导致的日常消费品的短缺；斯大林时期所实施恐怖统治的社会表现——对“人民的敌人”随意的逮捕、流放，恐惧以及缺乏信任的社会氛围，劳改营的艰苦环境，对党进行的大清洗；官方宣传的政治口号以及所采取的树立模范、典型手段的欺骗性。被强制集体化的农民，被驱逐的富农，被监视或被判有罪的工人，对其进行清洗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党员，被迫害的犹太人，斯大林本人，这些个人及群体都在该时期的政治笑话中被涉及。[1]

30 至 40 年代，政治笑话在苏联城市民众（特别是大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中较为广泛地传播起来。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总局 1936 年的记录中显示：“在一所牙科研究所，名叫 Logicheva 的学生曾说了各种各样的反苏笑话。在日丹诺夫工厂，费奥多罗夫，一名前共青团员，参与了反苏宣传。不久前，没收了他的一本笔记薄，里面收集了 1500 个笑话，大部分都是反苏笑话。”[2]民众不仅在家里讲政治笑话，有时亲密的朋友或同事也在街上和工作场间互换政治笑话，甚至有人敢在自己的日记和书籍中记录这些政治笑话。[3]政治笑话也流传于车间、红军的餐厅、学校的走廊里以及其他学术机构中，连党的高层显贵中也有人讲述政治笑话。[4]比如，曾经担任过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的卡尔·拉狄克[5]就喜欢讲政治笑话，甚至当着斯大林的面也肆无忌惮地讲述过关于斯大林的政治笑话。需要指出的是，在斯大林时期，关于斯大林本人的政治笑话是极少的。另外一点，在卫国战争时期，社会上基本没有流传着讽刺苏联的政治笑话，反而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关于纳粹的政治笑话。

在斯大林时期，政治笑话最突出的表现是民众讲政治笑话的氛围——隐蔽

---

[1] Christie Davies,Humour and Protest: Jokes under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007), 52:pp.291-305,294.

[2]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19.

[3]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6.

[4]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5.

[5] 卡尔·拉狄克（1885—1939），1917 年俄国革命中的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指控投敌叛国，后被处决。

性。政治笑话都是以“地下笑话”的形式而存在的，家人、亲戚以及认为是最亲密的或可信赖的朋友和同事之间才窃窃私语地交换、传播这些政治笑话，而不敢在公共场合或对不熟悉的人讲这种“不合时宜的”笑话。1950 年、1951 年美国哈弗大学社会学系的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教授和雷蒙德·宝华教授主导了“关于苏联社会生活的项目”，对西欧难民营中近 600 多名苏联人进行了采访。其中很多流亡者说道，“我们在家里讲反苏的笑话，当有莫斯科的亲戚来看我们时，他总是公开地诉说对苏联政权的不满，并且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反苏笑话”。[1]在有一定特权的家庭里长大的一名妇女说，“在我童年时，我的父母总是告诫我不要在外面说他们在家说过的话，他们经常说一些反政府的事情。每当我父亲出差回来时，他的朋友总问他：你带回来什么好东西没有？对我们来说他给我们带回来了礼物；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他带来了笑话”。[2]尽管民众讲政治笑话非常谨慎，也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讲这些打破禁忌的笑话，但也往往会因为一些粗心大意或意外而惹来麻烦。一位被参访者谈到：“我的叔叔 1931 年因为讲反苏笑话而被逮捕了。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当他想喝酒的时候，总是叫来他的朋友。一次他讲了一些反共产主义的笑话，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中有人已是秘密警察。在第二天，他们都被逮捕了，判了五年。”[3]另一名前苏联公民曾去参加堂妹的婚礼，他非常高兴，喝了很多酒，然后讲了两个政治笑话，“那气氛立刻显得紧张和不愉快，整个聚会被搞砸了”。[4]下面该则经典的政治笑话充分地体现出那时候民众表达对政权不满的复杂心态：

> “可以批评希特勒吗？”
>
> “当然可以，就跟批评斯大林一样。首先，你必须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然后盖上两条，最好是三条棉被，然后最好把两个枕头放在用毛毯裹着的头顶上。最后，你小声地说出你心里对那独裁者想说的话，必须把时间严格限在五分钟之内。”[5]

这一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官方对政治笑话的定性。到 20 年代末，当局已经不再对这种消遣方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评家 Vladimir

---

[1]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5.
[2]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5-6.
[3]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9.
[4]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14.
[5]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Blium 声明，“我们不需要讽刺”，“它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1]在 1933 年 1 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2]发表了演讲，忠告他的同事们不要低估政治幽默对党的威胁：“我想谈一下一种反党行为，被称之谓笑话。这些笑话是什么？这种笑话以鼓动的形式来反党。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用讲笑话的形式来削弱过去存在的政权的威信……现在，它又被当做一种灵敏的武器来抵抗党的中央委员会。”[3]1934 年莫斯科的一个会议上，一名叫基里洛夫的官员主张消灭讲政治笑话现象，反复强调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古老的社会习惯了。他认为，“我们经常忽视笑话和谣言的政治意义”，“但这是我们的敌人最频繁利用的手段之一。任何人讲这种笑话，尤其是涉及我们的党和领袖的笑话，不仅要揭露出来，而且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4]1927 年 11 月 25 日修改后的《苏俄刑法典》第 58 条 [10]对所谓的“反革命鼓动宣传罪”（或称为“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号召颠覆、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或为了号召实施特定的（本法典第 58 条 [2]到第 58 条 [9]所规定的）反革命罪行，而进行宣传或煽动的，或传播、制作或收藏具有这种内容的作品的，处于六个月以上剥夺自由。在群情不安时，或利用群众的宗教或民族偏见，或在战斗状态下，或在宣布戒严的地区实施上述行为的，处本法典第 58 条 [2]规定的社会保卫方法。”[5]可以看出，从 30 年代初开始，苏联当局已经把讲政治笑话认定为一种采取“口头鼓动宣传”形式的“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讲政治笑话、听政治笑话或记录政治笑话都是被禁止的。例如，佩尔科夫，技术学院二年级学生，因为讲那“最骇人听闻的反革命笑话”而被巴拉科夫的警察所接管。[6]特罗菲莫夫因说“基洛夫被杀后，面包变得便宜了；如果斯大林被杀了，事情将变得更好”而被判了 10 年。[7]一些集中营的幸存者讲述了因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事例。一位幸存者说他的母亲曾目睹了因一句粗心的旁白而被捕的事，他的母亲正在小镇上排队买鱼，其中一

[1]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15.
[2] 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1883—1954），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
[3]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70.
[4]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20.
[5] 陈汉章等译：《苏俄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 年版，第 27 页。
[6]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18.
[7]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18.

位妇女问鱼贩“你这鲲鱼怎么这么脏，而且还有怪味”，另一个顾客带着嘲讽的口气说道，“因为它们都是斯大林的鲲鱼”，这个人被告发了，送进了劳改营。[1]另一位幸存者说他在劳改营中碰到的一些人仅仅是因为听笑话而没有向当局汇报而被监禁了。[2]苏联民众甚至编制了笑话来讽刺这种犯罪：

两名劳改营犯人在谈论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这里。

其中一个人说，“我是因为懒惰。”

另一人问道：“什么意思？你没有好好工作？”

“不。我整夜在听我的一个朋友讲笑话，最后我想，该睡觉了，到明天早上我就向警察举报他。”

“那为什么说是懒惰？”

“他一直讲到第二天晚上。”[3]

在斯大林时期，大量的苏联民众因这种“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被逮捕。苏联内务部的档案中记载了 30 年代关于“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的数据：1931 年 100963 人，1933 年 32370 人，1934 年 16788 人，1935 年 43686 人，1936 年 32110 人，1937 年 234301 人，1938 年 57366 人，1939 年 24720 人，1940 年 18371 人。[4]由于内务部的档案并没有对涉及“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的案例进行详尽的分类，笔者并不能知道斯大林时期因政治笑话而被逮捕的确切人数，但是这类案件的数量还是占有不少份额的。整个苏维埃司法制度的奠基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5]对苏维埃最高法院 1935 年 9 月的 473 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中涉及“笑话、诗歌”的案例占 7%。[6]1949 年，15633 人因“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被逮捕，其中 5707 人是进行“口头宣传”；1951 年，3974 人因进行“口头宣传”而被捕。[7]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亚历山德

---

[1]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72.

[2]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72.

[3]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72.

[4] Sarah Davies,"Anti-Soviet Agitation"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30's,Cahiers du Monde russe,Vol. 39,No. 1/2,Les annees 30: Nouvelles directions de la recherche(Jan.-Jun.,1998),pp.149-167.

[5]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1885—1938），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军事家，革命家，政论家，整个苏维埃司法制度的奠基人，在大清洗中受到诬陷并被杀害，后平反。

[6] Sarah Davies,"Anti-Soviet Agitation"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30's,Cahiers du Monde russe,Vol. 39,No. 1/2,Les annees 30: Nouvelles directions de la recherche(Jan.-Jun.,1998),pp.149-167,156.

[7]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71.

罗维奇·麦德维杰夫[1]曾谈到，1953 年斯大林死后，当局命令释放了所有因笑话而被捕的人，当时成立的监督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曾提供给他一个数据，说这些"因笑话而被捕的大约有 20 万人"。[2]

斯大林时期，大量的苏联民众因这种"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被逮捕，大部分被判 3 年到 5 年。现在看来，讲政治笑话在当时并不算一种特别严重的罪行。在劳改营中，人们把因政治笑话而被关进来的人叫做"anekdotchniks"，与犯其它罪行的人加以区别，表明他们并不被认为是"人民真正的敌人"。当时社会上甚至产生了关于这种判刑的笑话：

劳改营中的犯人们问一名刚来的犯人判了多少年。

新来的犯人回答，"25 年"。

"犯了什么罪？"

"我没犯任何事情，我是无辜的。"

"别编故事了，无辜的人只判 5 年。"[3]

二、1953 年——1991 年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尤其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以来，苏联政治笑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苏联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和焦点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等直接与政治相关的层次，而且较多地涉及到国内的社会生活、民族问题以及对外关系的层次。就政治人物这一目标层次来讲，苏联各个时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身心方面的缺陷在政治笑话中得到了淋漓至尽的描述和讽刺，有时一些爱开玩笑者甚至用粗俗的语言来对领导人的性格进行讽刺。比如，赫鲁晓夫的急性子、过于匆忙和容易激动，勃列日涅夫的愚蠢、好大喜功、贪婪名誉及财物，甚至斯大林性格方面的专制和残忍以及列宁性格方面的某种丑化都在这一阶段的苏联政治笑话中体现出来。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笑话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方面。例如，短缺经济表现出的食物短缺、其他日常消费品的短缺以及所导致的排队购物现象和"黑市"现象

[1] 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1925—），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2]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74.

[3]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73.

的出现，偷窃、贿赂、酗酒、偷听国外广播以及出国等社会问题。苏联的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也成为政治笑话的主题，尤其是苏联的对外关系，比如苏中关系，苏美关系，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以及与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关系，其焦点主要是突出苏联的对外扩张战略以及输出革命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政治和特权阶层也在政治笑话中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除此之外，这一阶段苏联国内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官方长期的政治宣传的欺骗性依旧是政治笑话所关注的对象。

这一阶段苏联政治笑话最突出的表现是发展非常迅速。首先是数量上的发展，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烈日涅夫时期，政治笑话就如同山洪一般爆发出来，远远多于前一阶段的数量。以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布鲁斯·亚当斯教授的著作《俄国的微弱革命：20 世纪苏联政治笑话的历史》为例，该书共收集了 794 则政治笑话，涵盖了苏联的各个时期，其中该阶段（1953 年——1991 年）政治笑话为 612 则，占总数的 77%，而赫鲁晓夫时期和勃烈日涅夫时期政治笑话共为 508 则，约占总数的 64%（见表 1）。爱沙尼亚著名的语言学家 Jüri Viikberg 自 60 年代以来收集了约 4500 则政治笑话；Luule Krikmann 搜集了 550 则从 1965 年——1989 年的苏联政治笑话。[1]其次，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和焦点的范围不断扩大，几乎囊括了苏联政权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讲述过了。再次，政治笑话传播的社会氛围大大不同于斯大林时期。这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苏联各个阶层的人都越来越频繁地讲或听政治笑话。不仅仅包括普通的民众、一般的党政工作者及持不同政见者，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些官方文件当中都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在一些日常开会和谈话中引用当时特别流行的政治笑话。当时的 KGB 都惊讶讲政治笑话的人数之多，“他们都不得不停止逮捕讲关于赫鲁晓夫的政治笑话的人，否则他们将把整个国家的人监禁起来。”[2]学者米龙·彼得罗夫斯基甚至认为“整个社会由潜在的讲政治笑话和听政治笑话的人组成”。[3]而且讲政治笑话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比如，当时出现了被人们称为“阿飞”的小青年人，他们“对苏联的一切采取否定态度，赞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通常在互相之间，甚至在不熟悉的人中间”，用“特别的黑话”进行交谈。[4]就连在

---

[1] Arvo Krikmann,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Vol.43,2009,pp. 43-66,44.
[2]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155.
[3] Graham,Seth Benedict,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cdote,PhD thesis,U. of Pittsburgh,2003,p103.
[4] 沈志华、叶书宗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8 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小学当中都普遍地流传着政治笑话，比如，Kadi Sarv 曾在爱沙尼亚的小学中收集了近 800 则政治笑话。[1]二是政治笑话的传播逐渐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甚至出现了专业化的表演趋向。讲政治笑话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仅仅局限于特别亲密的、熟悉的小圈子内，这一时期很多民众往往在排队购物时也开始谈论政治笑话，甚至有些人喝醉酒时在大街上大声地讲政治笑话。1964 年初的一期《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应该向政治笑话开战!》的一封信，信里谈到政治笑话以及讲政治笑话都在迅速地增多，人们“在公共场地”讲政治笑话，经常“发出笑声”。[2]这时候一些喜剧演员和马戏团的幽默小丑也开始把讲政治笑话作为一种舞台上的表演形式，在城镇作流动性演出。70 年代中期，一些幽默小丑往往讲述一些讽刺生活必需品匮乏的政治幽默，比如著名的喜剧演员阿卡迪·雷金。在该阶段，苏联的政治笑话也大量流传到国外。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通过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来传播苏联政治笑话；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政治笑话，其中约一半都是关于苏联的政治笑话；中苏关系恶化直至 80 年代末，中国也流传着不少苏联的政治笑话，关于苏联的政治笑话一度是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报最受欢迎的栏目，除此之外，地方出版了一些专门收集苏联政治笑话的小册子。

表 1：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布鲁斯·亚当斯教授的著作《俄国的微弱革命：20 世纪苏联政治笑话的历史》中各个时期政治笑话的数量及其占总数的比例

各个时期	政治笑话的数量	占总数的比例
列宁时期	24	3%
斯大林时期	158	20%
赫鲁晓夫时期	297	37%
勃列日涅夫时期	211	27%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	37	5%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时期	67	8%

资料来源：Bruce Adams, 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 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 Routledge Curzon, 2005. 笔者对该书中的笑话进行数据整理。

该阶段苏联政治笑话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官方对政治笑话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苏联当局释放了斯大林时期因政治笑话而被关进劳改营中的

354 页。
[1] Arvo Krikmann, 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43, 2009, pp. 43-66, 44.
[2] Ben Lewis, 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 Pegasus Bossks, 2009, p176.

犯人。1953 年赫鲁晓夫政府开始实施大赦，成立了监督委员会组织、实施释放劳改营中囚犯的工作，首先就释放了所有被判“口头宣传罪”的犯人。其次，苏联当局对该类行为的政策变得较为温和。从 1958 年夏天开始，苏联当局停止开展大规模镇压“具有反苏言论”的行动，苏联最高法院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机构也反对进行该类行动。1959 年春天，赫鲁晓夫在给 KGB 官员的谈话中，认为对“反苏维埃宣传”的行为要强调“预防措施”，而不是进行检举、起诉，要求停止大规模的镇压行动。[1] 前 KGB 上校伊格尔·普列林回忆道，“1961 年，我们收到指示，上面命令我们停止逮捕从事‘反苏行为’的人，但代而取之的是要求我们与那些人进行‘谈话’。在谈话中，我们要向他们解释他们正在犯‘对苏联社会进行了错误的估计’的错误。我们将给他们一个官方的警告，威胁他们如果再从事这样的行为，就逮捕他们。有时我们让嫌疑犯写一份认错信，承认他的错误，然后寄给 KGB。信上必须写：‘今天我被要求到 KGB 办公室进行谈话，因为我——比如说——讲损害共产党领导人的笑话……并且解释我怎样犯的错，承诺我再也不这样做了。’”[2]这种谈话的预防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犯这种错误的一群人面前公开地谈话；一种是一对一地进行谈话。KGB 一般喜欢第二种谈话方式，因为他们不希望每个人都听到那个笑话。据说，有一次有人曾告诉勃列日涅夫民众正在讲他准备做扩胸手术以便挂下更多的奖章的笑话，勃列日涅夫回应道：“如果他们讲关于我的笑话，这说明他们爱我。”[3]需要指出的是，当苏联政权遇到国内外的政治危机时，便又会在一段时期内严厉地惩罚“反苏维埃鼓动宣传”行为。当赫鲁晓夫最初的“解冻”政策引起国内以及东欧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动乱时，1956 年 12 月 21 日，苏联当局指示加强镇压具有“反苏性质”行为的力度，在短期内，近 3500 人因“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被捕，被判在劳改营中服刑 3 年——6 年不等。1981 年——1983 年，苏联当局因波兰的政局动荡而加强了对国内民众的言论行为的控制。1981 年 Krokodil 杂志收到了含有一些政治笑话的信件，KGB 进行了 6 个月的调查，最终查明是一名妇女，她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她被捕了，并被指控收集政治笑话，于 1982 年 7 月被判 5 年徒刑，

---

[1]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155.

[2]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155—156.

[3]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17.

外加流放 5 年。[1]

总体上讲，自赫鲁晓夫时期以来直至苏联解体，因“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获刑的人数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是大大减少了。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 1957——1985 年期间，因从事反苏维埃的宣传和鼓动，以及散布明显虚假的诽谤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资料而被判刑的人员，共有 8124 人。[2]在赫鲁晓夫时期，从 1959 年春天开始，每年仅大约 200——300 人因口头的和书面的批评苏联的言论而被捕。[3]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整个 18 年内，大约只有 3000 人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捕，其中大多数案例涉及出版具有讽刺性的地下小册子。[4]1974 年，苏联中央委员会甚至给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发了一份公函，认为他逮捕了太多涉及“反苏维埃宣传”行为的人，安德罗波夫很气愤地回复了他们，“这十年来被捕的人数跟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两年半内被捕的人数差不多”。[5]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实行了改革，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等口号，民众的政治自由空间逐渐扩大，允许民众对苏联政府提出批评性意见。戈尔巴乔夫宣布的“公开性”方针甚至促使 1990 年通过了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法律。至此，政治笑话这种特殊的言论行为也具有了其合法性。有意思的是，当苏联民众越来越具有政治自由时，苏联政治笑话却逐步推出了其历史舞台。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鼎盛时期”

“60 至 70 年代是苏联政治笑话最强盛的时期”，[6]也就是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鼎盛时期”。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纵观苏联整个历史过程，这一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布鲁斯•亚当斯教授的著作《俄国的微弱革命：20 世纪苏联政治笑话的历史》为例，该书共收集了 794 则政治笑话，勃列日涅

---

[1]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17-218.

[2] 【俄】O.B.埃德尔曼编，方琼、唐福山译：《苏联检察院对 5810 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审查（1953—199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序言第 2 页。

[3]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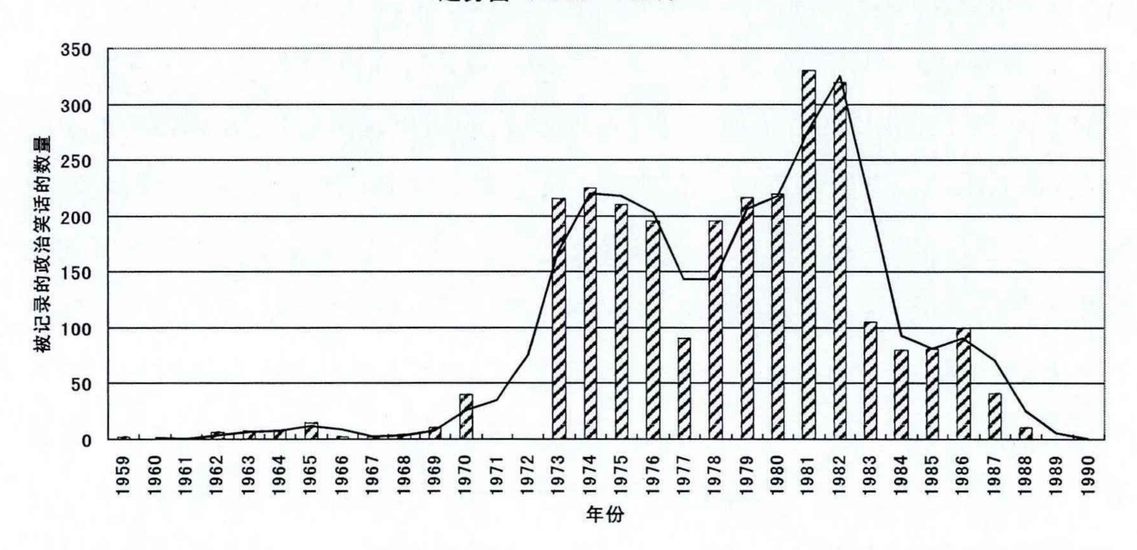
[4]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17.

[5]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17.

[6] Kadi Sarv, Childrens' Political Anecdotes-Register,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5,1997,pp.97-171.

夫时期的政治笑话的数量为 211 则，约占总数的 27%。而爱沙尼亚学者 Arvo Krikmann 对当时属于苏联的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 60 年代以来关于苏联政治笑话的研究更明确地证明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历史地位，如表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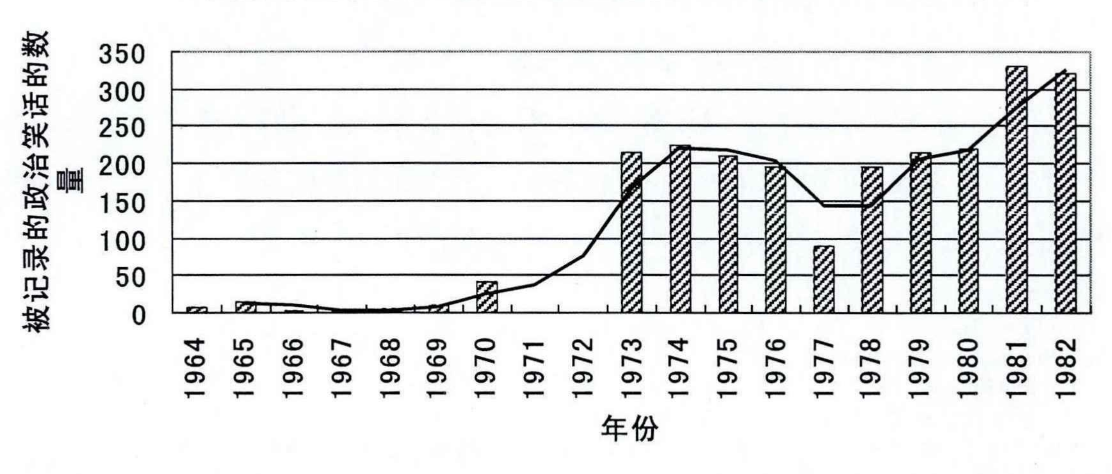
表2：Juri Viikberg和Luule Krikmann每年所记录的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及其趋势图（1959～1990）



资源来源：Arvo Krikmann, 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43, 2009, pp. 43-66, 44.

其次，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18 年来看，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初期，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笑话的数量并不是太多，自 1970 年以来，政治笑话开始大量地在社会中流传起来，“政治笑话的数量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达到顶峰”[1]。（见表 3）

表3:Juri Viikberg和Luule Krikmann每年记录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数量及其趋势图（1964～1982）



资料来源：Arvo Krikmann, 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43, 2009, pp. 43-66, 44.

---

[1] C.Banc(pseudonym) and Alan Dunders,First Prize ： Fifteen Years!(Cranbury,NJ,986),p15.

再次，该时期苏联政治笑话在社会上传播的速度加快。在斯大林时期，一则政治笑话在“两到三天内”便会传遍莫斯科市的大街小巷。[1]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一则新的政治笑话一旦出现，不用多长时间便会传遍整个城市。梅德·马卡罗夫博士在 1999 年曾谈到，KGB 在 70 年代曾进行过政治笑话流传速度的实验，“他们做出推论，一则政治笑话在六到八小时左右便会传遍一座如莫斯科市大小的城市”。[2]

英国克里斯蒂•戴维斯教授认为政治笑话是有层次的，“从中心到外围”，“从占优势到被支配”，“从较高层次到较低层次” 等。[3]美国戴维·L. 帕雷兹教授曾把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从高到低分为五个层次。从目标对象的角度来说，笔者也认为政治笑话是有高低层次的，最主要的依据标准就是看其目标对象是否逐步涉及整个政治体系，其政治笑话是否试图涉及或揭露出其政治体系的本质，而不仅仅停留在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或社会生活等具体现象层面。笔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存在着以下三大层次：政治人物层次、制度性层次和社会生活层次。下面笔者将分别从这三个层次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进行分析。

---

1 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p3.
2 Graham,Seth Benedict,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cdote,PhD thesis,U. of Pittsburgh,2003,p102.
3 Arvo Krikmann,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Vol.43,2009,pp. 43-66,62.

第三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政治人物层次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

在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 18 年之久，仅次于斯大林。但勃列日涅夫本人却是苏联政治笑话涉及最高领导人中笑话数量最多的人，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社会上充斥着大量关于他本人的流言蜚语。（见表 4、表 5）非常有意思的是，勃列日涅夫往往单独出现在自己的政治笑话中，关于他的政治笑话中有近一半以上都只涉及他一个人。而苏联其他时期的最高领导人（如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总是同一个或多个政治人物同时出现在一个政治笑话中。这只能说明这些政治笑话是为勃列日涅夫本人量身定做的，从政治笑话的角度充分体现了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所作所为。

表 4：Kadi Sarv 的《爱沙尼亚中学学生的政治笑话集》涉及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笑话的数量

列宁	斯大林	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	戈尔巴乔夫
55	22	12	61	48

资源来源：Arvo Krikmann, 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43, 2009, pp. 43-66. 笔者根据该资料进行数据整理。

表5：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在各时期的相对频率

相对频率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1959～1964
1965～1973
1974～1982
1983～1990
时期

资料来源：Arvo Krikmann, 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43, 2009, pp. 43-66.

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勃列日涅夫的才学及性格

最高领导人的才学和性格表现是爱开玩笑者最喜欢且最擅长的主题。勃列日

涅夫性格上的缺陷在政治笑话中得到了鲜明的、充分的展现。这些政治笑话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1、从平庸到昏庸

从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来看，他并不出众。在他刚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不少人认为他只是政治上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其实也就是中等技校毕业，“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识”。[1]“他特别不喜欢读书，更受不了写东西。”[2]“他是个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很弱的人，这正是他与所有的前任不同之处。他不具备列宁那样的智慧和政治天才。他没有斯大林那样超人的意志力和凶狠的专职本领。他缺乏赫鲁晓夫那种非凡的独立精神，宏大的改革思想和充沛的工作能力。不论从性格上看，还是从智力上看，勃列日涅夫都是个平庸浅薄的政治家。”[3]说白了，“他是政权顶峰上的市侩庸人”。[4]（笑话①—⑦）

①勃列日涅夫公寓的电话响了，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5]拿起电话，听到一名妇女问道，“您好，我找列昂尼德•伊里奇[6]。”

“你是谁？”

“我是他的一位老同学。”

“你就是那位妓女吧，列昂尼德从来没上过学。”[7]

②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8]（Krupskaia）去办公室拜访勃列日涅夫。她被领进去并做过介绍，但她想勃列日涅夫可能不知道她是谁。

“您好，列昂尼德•伊里奇，我是 Krupskaia。您应该知道我是谁，因为您知道我的丈夫。您经常引用他的著作。”

“非常欢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当然知道你是谁，还有你的丈夫。

---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张大楠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33 页。

2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8 页。

3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7 页。

4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杨春华、张道庆译：《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2 页。

5 指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勃列日涅娃（1908—1995），是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夫人。

6 指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1982），于 1964 年—1982 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本论文的政治笑话中凡出现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列昂尼德·伊里奇均指一个人，特别标明的除外。

7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4.

8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即列宁）的夫人，苏联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和教育家。

Krupsky 近来如何？"(Krupsky 是克鲁普斯卡娅这一姓氏的男性化形式，Krupskaia 是克鲁普斯卡娅这一姓氏的女性化形式，实际上指的都是一个人。当然了，众所周知，克鲁普斯卡娅的丈夫是列宁。)[1]

③当勃列日涅夫访问中亚时，他受到了当地党政官员的欢迎：

“和平降临于你！”

“和平降临于你！”他按照工作人员之前告诉他的话准确回复道。

“和平降临于你！”他们又说道。

“和平降临于你！”勃列日涅夫也回应到！

突然，出人意料地，人群中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大声喊道：“古拉格集中营！”

“古拉格集中营！”勃列日涅夫也愉快地应答着。[2]

④半夜时分，勃列日涅夫给柯西金打电话：“阿列克谢[3]，请告诉我，曾打败拿破仑海军的英国独眼海军上将是谁啊？我正在玩 6 个字母的填字游戏。”

“纳尔逊。”

凌晨时分又给柯西金打电话：“阿列克谢，那我们曾打败拿破仑的陆军元帅是谁啊？我正在玩 7 个字母的填字游戏。”

“库图佐夫。现在我可以好好睡觉了吧？”

黎明时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又来了：“阿列克谢，那只有一只眼睛的以色列将军是谁啊？”

“达扬。现在你可以不用再打扰我睡觉了吧？”

“听我说，阿列克谢，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挖去格列奇科的一只眼睛呢？”[4]

⑤当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后，勃列日涅夫召集苏联太空计划的领导人开会。

“党和政府决定让咱们的宇航员尽快地登上太阳。”

“但是，”他们反驳道，“太阳的温度太高了，宇航员们连接近它都不可能。”

勃列日涅夫说道：“你们当我是笨蛋吗？我们将在晚上让宇航员登陆。”[5]

⑥一位农民问勃列日涅夫共产主义是什么。

勃列日涅夫回答道：“现在我们的电车是每 15 分钟一趟，5 年后我们的电车每 10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4.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5.

[3] 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1904—1980），苏联政治人物，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5.

[5]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15.

分钟开一趟，15 年后我们的电车每 5 分钟一趟，20 年后我们的电车一直在走。”[1]

⑦助手对勃列日涅夫说道，“总书记，您今天穿了一只黑色的鞋子和一只棕色的鞋子。”

勃列日涅夫回答道：“我知道，我已经注意到了。”

“那您为什么不换掉呢？”

“我本来想去换掉。但我发现鞋橱里也是一只黑色的鞋子和一只棕色的鞋子。”[2]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时，他已老态龙锺，那时候的他依然固执地维护着自己的个人统治。早在 1969 年——1970 年间，他的健康就第一次出现严重问题。1976 年初，他甚至出现了医学上的临床死亡现象。在他最后执政的 6 年里，他发生过好几次心肌梗塞和中风。晚年的他甚至连过去那种照本宣科作演讲的能力都没有了，“发音方面错误百出”[3]。他出现在公共场合也是显得昏昏噩噩，不是遗失演讲稿，就是分不清是否该如何进行下去。“早在 60 年代，当电台或电视台转播勃列日涅夫冗长的报告或讲话时，就几乎没人收听了。到了 70 年代，甚至在公共场所——在旅馆或医院的休息室里——这种转播一开始，人们就散去，把电视关掉。”[4]他曾与和美国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期间，竟然当着尼克松的俄文翻译的面，问他的秘书：下面这段还念不念？[5]他已经非常昏庸无能了，这时候的苏联显然已经处于病夫治国的局面了。这样一位老人却并没有换来民众对他的敬佩和同情，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恼怒和嘲笑，这种情绪化越来越公开化了”。[6]（笑话①—⑤）

①勃列日涅夫去美国做演讲。演讲被限制在 25 分钟内。30 分钟过去了，40 分钟过去了，但他还在继续做演讲。“这是我的错”，他旁边的助手说道，“我不小心给了你三份演讲稿的复印稿。”[7]

②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式上勃列日涅夫发表官方演讲：“O!O!O!”

---

[1] Kadi Sarv, Childrens' Political Anecdotes-Register,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5,1997,pp.97-171.

[2]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3]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4 页。

[4]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4 页。

[5]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M】，北京：人们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2—33 页。

[6]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 页。

[7]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他身旁的人员小声地对他说“伊里奇，下面可以开始演讲了。那是奥运会会微。”[1]

③勃列日涅夫正在接见撒切尔：“非常受人尊敬的英迪拉•甘地！”

“她不是英迪拉•甘地，她是撒切尔！”

“我知道，但这演讲稿上写的是英迪拉•甘地。”[2]

④勃列日涅夫正在进行演讲的时候，突然听众中一个人被逮捕了，最后查出那个听众是间谍。

“你怎样认出了那个敌人？”勃列日涅夫问普罗宁少校。

“我从您演讲中经典的句子判断出来的——‘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3]

⑤勃列日涅夫听到有人敲门，他迅速抓起一张纸，找到他需要的语句，然后走到门口，读到：“谁在哪里？”[4]

2、享乐至上

勃列日涅夫是一位享乐至上主义者。“他本人、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周围的人们强烈地表现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气质、小市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5]那就是十足的虚荣心和贪婪的恶习，以及对自己缺乏自制力。权力和疾病进一步加剧了勃列日涅夫对物质的挥霍。事实上，他是那一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最高代表者。有人曾经向勃列日涅夫说起低收入者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而勃列日涅夫却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你们不懂得生活。谁也不能只靠工资过日子。我记得年轻时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我们给车皮卸货挣外快。我们当时是怎么干的呢？从车皮上卸下的东西中，每搬运三个麻袋或箱子，就自己留一个。国内所有的人都是这么生活的。”[6]

他收藏的高级轿车有一百多辆，大多数都是外国领导人作为礼物送给苏联的，而他却把它们占为己有，甚至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别人。1971 年，他的女儿和丘尔巴诺夫结婚时，他还送给女婿一辆“斯克达”牌轿车，而这辆轿车是捷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6.

[2] Kadi Sarv, Childrens' Political Anecdotes-Register,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5,1997,pp.97-171.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7.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7.

[5]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37 页。

[6]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6 页。

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送给他的。[1]勃列日涅夫也非常喜欢其他奢侈品，比如法国的领带、金袖扣、钻石等。T·阿利耶夫在巴库送给他一颗金刚钻石，“他堂而皇之、忘乎所以地在百万苏联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2]苏共雅库什州委第一书记T·奇里亚耶夫送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只杯子更是令人咋舌。“这只杯子用猛犸大象的牙齿精雕细刻而成，上面还嵌有钻石和其他镶银边的宝石。珠宝加工厂用了五种总重量近12克拉的高纯度天然金刚石来磨制这些饰物，莫斯科的匠人用了五块金刚石做出六块钻石，还用碎料磨制出十二朵玫瑰花。莫斯科珠宝加工厂还制作了三根杯脚和杯箍。杯体有六条花边，是用白银铸成，上面也镶着宝石。在上边的三条花边上，在宝石和玫瑰花之间还镶有两颗红宝石。”[3]1988年7月10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曾披露出几年前苏联设在瑞士的一家银行破产的内幕时说，“该银行曾挪用巨款为苏联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购买贵重物品”，经调查是动用大量公款“购买贵重手表和瑞士名画”。[4]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女按摩师都浑身散发着“阿贝斯”香水味。关于勃列日涅夫贪图享受的政治笑话不仅流传在苏联民众中，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都援引了一则非常经典的政治笑话。（见笑话③）[5]（笑话①—③）

①领导人正在参加首脑峰会，休息期间，戴高乐将军掏出一个银质的香烟盒，上面刻着“伟大的法国人民献给戴高乐将军”。
威尔逊总统掏出一个金质的香烟盒，上面刻着“爱妻送给丈夫”。
勃列日涅夫掏出一个镶着宝石的铂金质的香烟盒，上面刻着“俄国贵族献给伟大的亚历山大二世陛下”。[6]

②1968年8月捷克领导人被允许离开莫斯科后，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说，“看，杜布切克的这只手表真精致啊！”
“让我看看，”柯西金说道。[7]

③勃列日涅夫坐着豪华轿车去乡村接他年迈的母亲去莫斯科。豪华的轿车，柴可夫

---

[1]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M】，北京：人们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2]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
[3] 【俄】谢尔盖·谢曼诺夫著，孙静萱译：《勃列日涅夫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
[4] 《人民日报》，1988年7月12日第6版，新华社发。
[5]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3.
[7]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3.

斯基的唱片，这使他母亲感到很惊讶。到克里姆林宫后，勃列日涅夫让他的母亲参观自己宽敞的公寓——精美的家具、地毯、名画、瓷器、银器、晶质玻璃制品，这些大部分都是以前沙皇的珍藏。当勃列日涅夫问他母亲感觉如何时，他母亲既惊讶又恐惧，不知所措。很长时间后他母亲流着眼泪说道："孩子啊，共产党来了，那你咋办啊？"[1]

二、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

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权力欲望很重的人。正如格•阿•阿尔巴托夫对他的评价，"在权力问题上他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能根据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参数去传统地理解现实主义。那就是：领袖的权力并不取决于在其治下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领导上的政策赢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舆论反应，而是首先取决于它的实力——真正的、无情的、有形的强制力。"[2]他在处理其他事务方面可以小心谨慎、甚至优柔寡断，但在政治权力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贪婪鬼。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便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一是对自己潜在的对手进行打压，削弱他们的权力；二是不断地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圈子"，扩大自己的权力。1969 年上半年，勃列日涅夫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把一大批军队高级领导人清除掉，然后安插进对自己忠心的人。70 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已经把手伸进了国家和政府领域，所谓的"三驾马车"已经形同虚设，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1976 年，他兼任了国防会议主席职务。1977 年，他又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 70 年代中期，他已经完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再也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他了。这时候的他更是独断专行、唯我独大，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我就是沙皇。"[3]最后几年，病魔缠身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执政的能力，但他却紧紧抱住权力不放直至死亡。当时很多苏联民众都认为他就要死了，但却多次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或许，他自己心里认为他真的可以永远不死，永远把持着最高权力。（笑话①—⑤）

①"我们已经被愚弄好久了！"勃列日涅夫把眉毛往自己的鼻梁处撇了撇，说道。[4]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3.

[2]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34—335 页。

[3] 【俄】维戈•阿法纳西耶夫著、贾泽林译：《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M】，东方出版社，1993 年版，第 70 页。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勃列日涅夫的一对浓眉是非常出名的，往下一撇，更显出他独断专行的样子。——笔者注）

②“勃列日涅夫的眉毛是什么样的？”

“是斯大林的胡须，只是在更高的水平上。”[1]（勃列日涅夫逐步恢复斯大林的名誉，那时候民众往往把他同斯大林作比较。——笔者注）

③“勃列日涅夫与上帝有什么不同？”

“上帝的仁慈是绝对的，而勃列日涅夫却相对是无情的。”[2]

④“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能获得元帅的头衔？”

“因为他统治着克林姆林宫。”[3]

⑤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孙子正在散步。

“爷爷，我长大后，我能当上总书记吗？”

“你说什么啊，孩子，怎么能有两位总书记呢？”[4]

三、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再加上个人集权，必然导致个人崇拜的出现。随着勃列日涅夫在政治权力上达到巅峰，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他的疑心过重和爱听流言的毛病已经充分暴露，他的虚荣心（最初显然是精心掩盖起来），即酷爱美化自己的心理，经阿谀奉承者巧言令色之后得到膨胀直至变得不可收拾。”[5]苏联的造神运动在沉静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1970 年，勃列日涅夫参观了在白俄罗斯由国防部长安·格列齐科亲自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苏军军事演习后，回到莫斯科，很多中央委员开始向他表示忠心。“所有的报刊、广播、宣传机器及全部归苏斯洛夫领导的意识形态机构都迅速地改弦易辙，赞扬起‘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和‘杰出的和平战士’勃列日涅夫来了。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已不再是个领导人、不只是地位平等的领导成员中排行第

Curzon,2005,p108.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8.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9.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1.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5.

[5]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38 页。

一的人，他成了不容争议的党的‘领袖’和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了。”[1]1973 年，党的区委、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散发了由苏斯洛夫起草的《必须加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统治威信》的文件。1976 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 70 诞辰时，掀起了赞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 7 天的专栏。[2]那时候他获得了一系列非常荣耀的称号："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今天的列宁"等。1977 年 11 月 7 日，莫斯科红场上出现了"两个伊里奇"的肖像并排挂着，而且打破惯例，两张肖像的式样和大小都一模一样，使老百姓一眼就明白，"出现了两个历史人物"。[3]他在苏共二十六大做报告时，"被 78 次掌声、40 次长时间的掌声和 8 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笑话①—⑤)

①勃列日涅夫当上总书记后，党宣传部门的人员征询应该如何称呼他：伟大领袖，各个时代和民族的天才，国父？
勃列日涅夫说："叫我伊里奇就行了。"[4]

②一次高规格的苏联代表团正在返回途中，突然飞机的尾部脱落了，官员们命悬一线，死死抓住能抓着的东西。飞机正在快速下落。
勃列日涅夫大喊道，"苏联永垂不朽！"
急促但暴风雨般的掌声之后，飞机开始运行正常，最终安全抵达莫斯科。[5]

③电话响了，勃列日涅夫拿起话筒说道："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在听。"[6]

④勃列日涅夫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说：
"昨天政治局决定改称我为皇帝。但是，我要负责地声明：他们会因此使我感到为难。因为，我的姓和父名分别是列昂尼德和伊里奇，今后不知道是该叫我列昂尼德一世，还是叫伊里奇二世。"[7]（列昂尼德是名，出处有误。——笔者注）

⑤"你的事迹无人所知，但你的名字将永垂不朽。"[8]

---

[1]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2 页。
[2] 陆南泉：《走进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99 页。
[3]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3 页。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9.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2.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1.
[7]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07—308 页。
[8]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苏联当局为了树立起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不惜篡改历史事实，过分地夸大、甚至是虚构出勃列日涅夫年轻时期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围绕着勃列日涅夫战争生涯的神话编造出来了”[1]。于是由人撰写的勃列日涅夫的三本回忆录——《小地》、《复兴》、《垦荒地》——问世了，被大量发行，并且被加以各种吹捧。在这些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不停地向人们炫耀：“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党的忠诚战士的极大幸福感”。[2]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979 年这些作品中还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笑话①—⑤）

①你听说勃列日涅夫的新书——《复兴》——被翻译成意大利语了吗？它是被当成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出版的。[3]

②1970 年有一篇老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回忆录写到：“我记得 1917 年十月的一天，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在彼得格列大街上边走边讨论应该何时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就在这时，长着一对浓浓的眉毛的一位年轻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并说道，‘25 日，叔叔，就 25 日好了。’‘过来，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列宁问道。‘巴列里纳’，男孩回答道。”（巴列里纳是列昂尼德的小名）[4]

③1945 年 4 月的最后几天，朱可夫元帅致电斯大林，汇报说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未来的四天内可以攻下柏林，他请斯大林同意这个计划。斯大林答复道：“朱可夫同志，我认同你这个计划，但请给我十五分钟去听一下勃列日涅夫上校的意见。”[5]

④当勃列日涅夫正坐在办公室里玩弄他的列宁奖章时，苏斯洛夫进来了。勃列日涅夫说道：“苏斯洛夫，你读了我写的《小地》那本书了吗？”
“当然读了，伊里奇。那是一本了不起的书，非常重要，尤其对咱们的下一代。”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真的，伊里奇。我什么时候跟你撒过谎啊。”
“很好。让柯西金进来。”
柯西金进来了。

Curzon,2005,p110.

[1]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1 页。

[2] 赵凤珍、丁炳福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八集）》【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01 页。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0.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0.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0.

"你好，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1]！"

"我不是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哦，你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

"我也不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

"不要再打断我的话了。告诉我，你读过《小地》吗？"

"当然读了，是本伟大的书。我现在正在读第三遍。"

"看来人人都喜欢读我的书，"勃列日涅夫边玩奖章边说道，"我想，或许我也该抽空读一下它。"[2]

⑤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助手说道："咱们的媒体都在频繁地称赞我的新作，我也很好奇。我想，或许改天我也应该读一下它。"[3]

勃列日涅夫对奖章和荣誉更是情有独钟，达到非常痴迷的地步。勃列日涅夫一生获得了200多枚奖章，这为他的葬礼都带了麻烦，为他捧勋章的高级军官多达44人。1976年5月8日，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苏联元帅军衔。苏联的很多城市、街道和企业都是以他的姓名命名。"毫无讲演天才的勃列日涅夫却几乎每周都要发表讲话和作报告，通过电视向全国播放，或者是汇编成专门的纪录片。"[4]（笑话①—⑧）

①勃列日涅夫的家人正在吃晚饭。突然，整个房子像地震一样颤抖起来。"我的天呐，这是怎么了？"他的女儿加莉娅问道。

"别担心，"她的母亲说道，"这肯定是你父亲的外套掉在地上了。"[5]

②"最近咋没看到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他去医院做手术了。"

"做什么手术？"

"做扩胸手术，以便可以容纳更多的奖章。"[6]

③勃列日涅夫又一次获得勋章后发表讲话：

"有些人批评说我接受的勋章太多了，不能自觉地拒绝这些勋章。同志们！情况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例如，不久前我就自觉地拒绝了布隆迪的国家最高荣誉勋章

---

1 此人应该指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曾成为克格勃驻外间谍头目。
2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3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4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5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15.
6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挂在鼻子上的金环。”[1]（指鼻子上已经挂不下了——笔者注）

④白宫的一个灯泡烧坏了。尼克松按了一下按钮，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换了一个灯泡。尼克松给了他 5 美元。

克里姆林宫的一个灯泡坏了。勃列日涅夫的侍卫叫来一名工作人员。那名工作人员换了一个灯泡。勃列日涅夫给了他自己一枚列宁奖章，也给了那名工作人员一枚奖章。勃列日涅夫觉得不错，又给了他自己一枚奖章。[2]

⑤“勃列日涅夫将被授予大元帅头衔吗？”

“对的，并且如果‘大元帅’三个字他能准确发音的话，还将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3]

⑥“新的五年计划将被命名为什么？”

“元帅计划。”[4]

⑦勃列日涅夫：“我应该当元帅。”

格列奇科：“除非我死了。”[5]

⑧某天，他们推荐看第四频道。一位公民从电视台的第四频道改成第一频道，看见勃列日涅夫正在做报告。他把台换成第二频道，还是关于勃列日涅夫，然后他换成第三频道，依然是关于勃列日涅夫。最后他又改成第四频道，这次他看到屏幕里一位 KGB 官员坐在那里，做着手势威胁到，“禁止再换台”。[6]

苏联当局“花了差不多 15 的时间”,“竭尽全力来制造对勃列日涅夫的迷信”，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也没有在苏联民众心中树立起威权型领导人的形象，“这台价值昂贵的宣传机器白忙了”。[7]“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到底也未能深入人们的意识或下意识中，人们对他持一种无所谓的冷漠态度，而到了他晚年，则变成了不加掩饰的蔑视。”[8]1982 年，他终于去世了，一丝一毫“全民悲恸”的气氛也没

[1]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16 页。
[2] Kadi Sarv, Childrens' Political Anecdotes-Register,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5,1997,pp.97-171.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1.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1.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0.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1.
[7]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1 页。
[8] 【苏】梅德韦杰夫等著，舟山选编：《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1 页。

没有。相反，民众用政治笑话来更加对他进行无情的讽刺和调侃。（笑话①—④）

①“听听这个不错的笑话。那女清洁工进入勃列日涅夫的卧室，发现他死了。”
“哦，那然后呢？”
“然后我不记得了，你觉得开头如何？”[1]

②勃列日涅夫死了，但他的身体永垂不朽。[2]

③“听说了吗？勃列日涅夫死了。”
“真的？他亲自吗？”[3]（实际上是讽刺“personally”，那时候官方总是宣传领导人“亲自……”——笔者注）

④勃列日涅夫正牵着一只猴子散步。一位农民说道：“跟一头牛走在一块不觉得别扭吗？”
勃列日涅夫说道：“它是一只猴子。”
那位农民回答道：“我没跟你说话，我在跟那只猴子说话。”[4]

第二节 列宁、恰巴耶夫和施季里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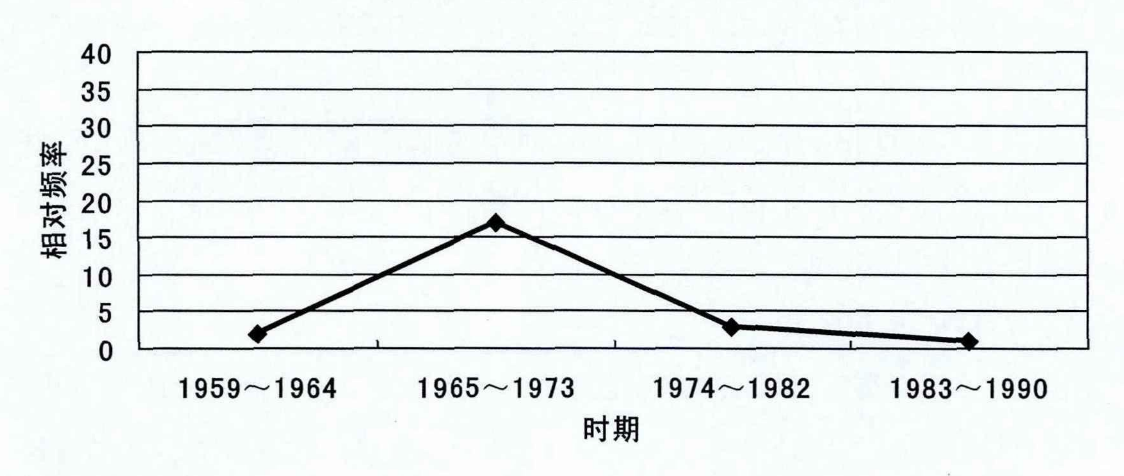
不仅勃列日涅夫是该时期苏联民众嘲弄和讽刺的政治人物，就连去世多年的列宁和恰巴耶夫在该时期也冒出来成为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除此之外，电影中虚构出来的苏联特工施季里茨也是这一时期苏联百姓口中经常讽刺的对象。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前，关于列宁的政治笑话并不多，仅有的一些政治笑话也大多是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或者勃列日涅夫等其他领导人一起出现。在那些政治笑话中，民众也几乎没有对他进行嘲弄和讽刺，绝大多数都是比较“温和的”，从那些政治笑话中也可以看出民众对列宁的肯定和尊敬之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关于列宁的政治笑话铺天盖地般在社会上流传起来，尤其到列宁诞辰 100 周年，其数量达到“顶峰”（见表 6）。这时候，苏联民众在政治笑话中对列宁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挖苦，使用的语言都是尖酸刻薄的，甚至是诽谤和侮辱。关于恰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5.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5.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5.
[4] Kadi Sarv, Childrens' Political Anecdotes-Register,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5,1997,pp.97-171.
[5] 从苏联政治笑话的角度看，苏联民众是把恰巴耶夫和施季里茨这两个人物看成是官方政治宣传的工具，因此笔者也把这两个人物归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政治人物层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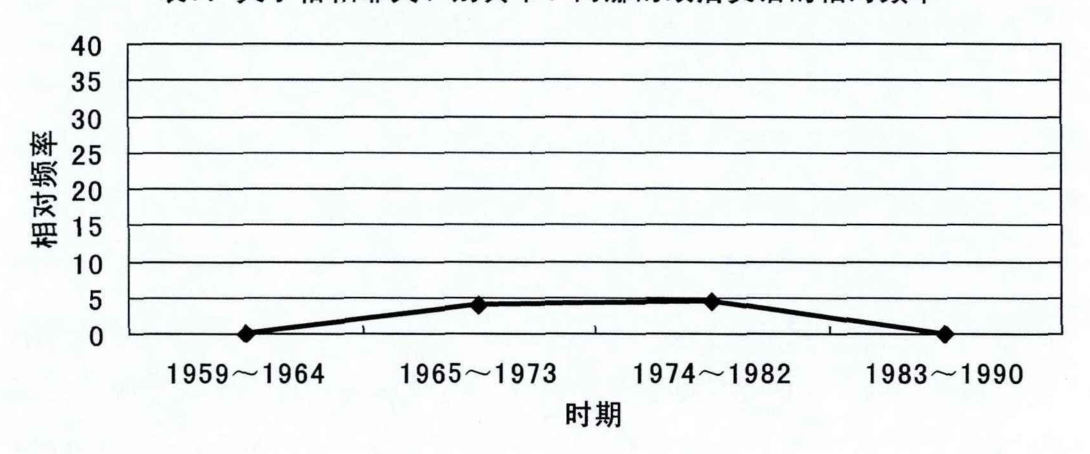
巴耶夫的政治笑话的数量和讽刺程度也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顶峰”（见表7）。至于塑造出来的电影人物施季里茨成为苏联民众嘲弄的政治人物绝对是 70 年代政治笑话的产物。

表6：关于列宁的政治笑话在各个时期的相对频率



资料来源：Arvo Krikmann, 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43, 2009, pp. 43-66.

表7：关于恰帕耶夫、别其卡、阿娜的政治笑话的相对频率



资料来源：Arvo Krikmann, 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43, 2009, pp. 43-66. 别其卡和阿娜是《恰巴耶夫》小说中恰巴耶夫的助手。

列宁、恰巴耶夫和施季里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中成为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不表明在苏联民众的心中，列宁已从伟大领袖成为被鞭笞的罪人，恰巴耶夫从昔日的战争英雄成为浑身有毛病的小丑，颇受观众喜欢的电影形象施季里茨成为一个十分愚蠢、滑稽的人。实际上，列宁、恰巴耶夫和施季里茨依旧是苏联大多数民众心中所喜爱和崇拜的人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政治笑话

的真实用意是表现民众“在内心对难以容忍的宣传特别感到讨厌”[1]。“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对宣传部与各届领导都没有良好的印象，更多的是有一种厌恶的感觉。”[2]正如下面这则政治笑话点破了官方宣传的力量：

“资本主义的宣传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其中任意一个的宣传。”[3]

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关于列宁、恰巴耶夫和施季里茨这三个政治人物的政治笑话都是突出官方宣传在力度上的过度渲染。这也是笔者把这三个目标对象放在一块加于研究的原因。

一、官方对列宁的过度渲染

列宁去世后，苏联当局不停地制造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到了 70 年代，尤其是在 1970 年列宁诞辰 100 周年之际，当局发动了史上对列宁最强大的造神运动。早在 1969 年，当局就在忙着为列宁诞辰 100 周年大庆年做准备。1969 年 10 月 1 日，在阿拉木图市举行了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国际讨论会，勃列日涅夫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数以千计的单位、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劳动者以数不甚数的劳动胜利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竞赛中许多优胜企业单位和组织荣获了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大庆奖状。”[4]1970 年 4 月 16 日，勃列日涅夫在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纪念馆开幕式上说道：“苏联人民正以劳动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新的大高涨来迎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一百周年。”[5]在 1970 年，苏联官方的宣传机器为庆祝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忙得不亦乐乎。大量纪念列宁的书籍充斥着整个社会，有文学作品、回忆录、画册、漫画以及数百万本的小册子；仅 1970 年就新建立了 10 所列宁博物馆，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列宁呆过的地方”，如 1970 年 4 月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兴建了非常著名的列宁生平纪念馆；这一年还兴建了许多列宁像，如在乌兰乌德[6]兴建了最大的一座列宁像；以列宁命名的街道、广场、学校、企业甚至日用物品更是数不胜数；苏联当局还专门发行了列宁纪念币和纪念邮票；报刊上、电视上大篇幅地为列宁歌功颂德，大街上到处都贴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20 页。

[2] 陆南泉：《走进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14 页。

[3]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4]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六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88 页。

[5]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六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51 页。

[6] 现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东西伯利亚第三大城市。

满了纪念列宁的标语——“列宁活着”、“列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列宁永垂不朽”；当局极力号召、组织大量民众去参观列宁墓和列宁纪念馆。除此之外，当局还号召苏联民众想尽办法来自我纪念列宁。苏联官方宣传机器的过度宣传使民众认为，“列宁活着并且在某一时刻，当人民重新需要他时复活”。[1]（笑话①—⑩）

①公元 2000 年。地铁车厢里的扬声器广播道："这是到达列宁站的列宁线。下一站：列宁站。"[2]

②一对新婚夫妇去家具店买床，买了一张新的三人床回家。因为列宁永远和我们(指苏联民众——笔者注）在一起。[3]

③一名衣着不整而且没刮胡子的学生前来考试。老师问，“你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我害怕啊。我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全是‘列宁活着’。我打开电视，听到的也全是‘列宁活着’。所以我不敢用我的电动剃胡刀。”[4]

④先锋营的管理员给孩子们出了一个谜语：“孩子们，猜猜这是什么。皮肤灰色，有一对大耳朵，满地里乱跳。”

孩子们一脸茫然的表情。

“好，继续，我们唱的所有歌曲都是关于谁的？”

孩子们齐声说道，“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列宁叔叔！”[5]

⑤精神病院里医生正在给病人做检查：“你叫什么名字？”

“Ehhhh……”（满脸惊讶）

“你来自哪里？”

“Behhhh……”

“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Mehhhh……”

“你知道今年是哪年吗？”

“庆典年。”[1]

---

[1] 【俄】鲁斯捷姆·瓦希托夫著、李瑞琴译：《从个人崇拜到公民崇敬：列宁在当代俄罗斯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J】，国外理论动态，2009 年第 8 期，第 15 页。

[2]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07.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4.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4.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4.

⑥1970 年，大学入学考试正在进行中。一名老师尝试让一名差生说出当前最突出的事件："今年我们正在举办什么庆典活动？"

"我不知道，课本里没有。"

"那你没看报纸和杂志吗？你没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吗？"

"在我们镇里没有你说的这些。"

"那你来自哪个镇？"

"来自 Flyshitton。"

教授对他的助手说："你觉得这个夏天我们逃到那里怎样？"[2]

⑦两位学生决定去"列宁呆过的地方"旅游——去看看日内瓦、伦敦、布鲁塞尔、巴黎，这些地方都是列宁曾移居过的地方。他们让他们学校的党委开介绍信（目的为了能办签证出境）。

他们被告知："我非常理解你们的愿望，但目前还是建议你们去参观辛比尔斯克[3]（伏尔加河旁列宁出生地），苏申斯克（列宁被流放的西伯利亚地区），列宁山（在莫斯科大学附近的莫斯科河堤岸）。"[4]

⑧克格勃举办了一场关于庆典活动的最好的笑话的竞赛：

一等奖：与列宁的一次会晤。

二等奖：政府出资的为期 7 年的住房。

三等奖：在"列宁呆过的地方"生活 5 年。[5]

⑨一个新的纪念喷泉：列宁泉水

香水：伊里奇的气味

粉末：列宁的骨灰

奶罩：列宁山

蛋：列宁的睾丸

小孩的玩具：带按钮的陵墓，一按它，斯大林的棺材便飞出去了。

公园里的射击场：范尼•卡普兰（她在 1919 年曾经向列宁开枪）[6]

机车时钟：在整点时刻，列宁弹起来，伸出手臂，庄重地说道，"同志们，布尔什

---

[1]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08.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5.

[3] 1924 年更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5.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6.

[6] 盲人范尼•卡普兰是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曾承认在 1918 年 8 月 30 日晚开枪射击列宁，"它在 1919 年曾经向列宁开枪"应该是原文有误。

维克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布谷鸟自鸣钟。”[1]

⑩人类被分为两类：“见过列宁活着的人，和在陵墓里见过列宁的人。”[2]

在70年代，一方面苏联当局疯狂地对列宁进行造神运动；另一方面，苏联民众也在疯狂地制造对“列宁的黑色个人崇拜”，[3]即：对列宁进行妖魔化。这一点在一些政治笑话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对列宁的品行进行歪曲和丑化，甚至进行“性幽默”。（笑话①—⑧）

①克鲁普斯卡娅正在对一群孩子说：“人人都知道列宁亲切。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刮胡子，正好一个小孩站在他旁边。列宁磨了磨剃刀的刀刃，然后抚摸着那个小孩。他刮完胡子，冲洗了剃须刷，磨了磨剃刀的刀刃，然后又抚摸着那个小孩。最后他擦干剃须刀并把它放在盒子里。他绝没有划破那个小孩。”[4]

②一场列宁艺术展览会在练马场（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沙皇骑术学院）开幕。参观者站在一幅名为《列宁在波兰》的画布面前。那幅画上画的是一张床上伸出两双腿，一双脚趾向上，一双脚趾向下。

“这不是列宁在拉兹列夫的小屋吗？”（1917年7月至10月列宁躲避彼得格勒警察的地方）

“相当正确。”

“但那都是谁的腿啊？”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5]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

“但列宁在哪儿呢？”

“列宁在波兰。”[6]

③“告诉我，雅可夫・米哈依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7]，他们说的是真的吗，听说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在放逐期间花费大量的时间手淫？”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6.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6.

[3] 【俄】鲁斯捷姆・瓦希托夫著、李瑞琴译：《从个人崇拜到公民崇敬：列宁在当代俄罗斯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J】，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8期，第16页。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7—128.

[5] 指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苏联党和国家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第一届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即克格勃的创始人。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8.

[7] 雅可夫・米哈依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列宁的亲密战友，1917年11月8日当选为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你在说什么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总是在读资本论。”

“浪费时间，我的朋友，真是浪费时间！我可以告诉你，手淫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消遣方式。你应该明白，这绝不会使我从革命事业分心的！但千万不能告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她是特别纯洁、高尚的人。”[1]

④又一个不眠之夜之后捷尔任斯基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非常疲倦，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列宁悄悄地走到他身边，然后猛打他的后脑。捷尔任斯基醒来四处张望。“明白了，检验一下我的革命警惕性。”[2]

⑤列宁的秘书宣布，“红十字会给你们寄来一个包裹。”

列宁说：“孩子，把它们给孩子吧。”

秘书说：“这是预防药。”

列宁说：“给捷尔任斯基留二十包，剩余的扎破，然后把它们送给孟什维克党人。”[3]

⑥一位农民请愿者来见列宁。

“欢迎，请愿者同志，请坐！你当真是一位贫农吗？”

“不确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或许不是。你知道，我有一匹马。”

“啊，那你是中农啦？”

“可以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没有挨饿，孩子们还有鞋。事实上我有两匹马。”

“啊，你竟然是富农。”

“或许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我们都喝白菜汤，孩子们有衣服穿，因此邻居们有时对我说，‘你，阿法纳西耶夫，是位富农呢。’”

“啊，富农，恩，恩，恩。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枪毙这位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吃晚餐时间了，晚餐后再枪毙他吧。”

“不行，立刻，一定要在晚餐前执行。把他的晚餐给挨饿的儿童吃吧。”[4]

⑦农民请愿者来见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已经没有吃的了，只剩下麦秆了。”

“那你们只能吃麦秆了。”

“我们已经吃了，吃完后我们哞哞叫。”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9.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9.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9.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9—130.

“那是咋回事啊？我每天都喝椴树蜂蜜，你也没有听见嗡嗡声啊。”[1]

⑧两位母亲正在谈论他们的孩子。

“伊万变得真像普希金，总是写啊，写……”

“费奥多尔却像列宁，总是在监狱或者被流放。”[2]

二、官方对恰巴耶夫的过度渲染

1887 年，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恰巴耶夫（中文译名又称“夏伯阳”）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就是一个顽皮但却很聪明、机灵的孩子。他曾经上过中等师范学校，“学习用功上进，成绩也不错”[3]。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友情的人，曾承诺为死去的战友照顾其妻儿。他于 1917 年 9 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短短 3 个月后就被第 138 步兵师的战士们选举为司令员。随后，他又指挥了第二尼古拉夫师和第二十五来复枪师。1919 年内战爆发后，他在伏龙芝的指挥下奔赴东线和高尔察克同白军英勇作战，视死如归。1919 年 9 月 5 日，所率的师部在利比时申斯克附近遭到白军的埋伏，他试图泅渡乌拉尔河脱险，结果溺水身亡。

尽管恰巴耶夫算得上一位内战英雄，但成为全苏联民众乃至全世界都耳熟能详的大英雄，成为民众心目中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神话，这俨然是苏联当局文化意识形态大肆渗透的结果。1923 年，恰巴耶夫的战友富尔曼诺夫[4]创作了他最畅销的小说《恰巴耶夫》。1934 年，瓦西里耶夫兄弟[5]执导了电影《恰巴耶夫》，在执导过程中为其艺术形象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必须把夏伯阳的形象提高到传奇的高度，使观众能相信他是一个可以被我们奉为楷模的人。”[6]这之后，在苏联兴起了一股以恰巴耶夫的事迹为素材的文艺创作高潮，“既有民间文艺形式的童话、勇士歌谣，也有诗歌、歌曲、绘画、雕塑等”。[7]“艺术形象取代历史真实而深植人们意识之中”，“没有谁知道他实际上是个怎样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有的是关于他的某种印象——一个英雄，这大家都知道”。[8]1964 年，在《恰巴耶夫》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0.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0.

[3] 朱岩：《硬汉夏伯阳：战槌英雄难逃美人芳心》【J】，《文史博览》2009 年第 7 期，第 36 页。

[4] 指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富尔曼诺夫（1891—1926），苏联作家，曾任恰巴耶夫师政治委员。

[5] 指 G.N.瓦西里耶夫（1899—1946）和 S.D.瓦西里耶夫(1900—1959)，两位长期合作的苏联电影导演兼编剧，并不是亲兄弟。

[6] 贺红英：《夏伯阳：一种“苏维埃神话模式”的确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9 年第 2 期（总第 212 期），第 48 页。

[7] 贺红英：《夏伯阳：一种“苏维埃神话模式”的确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9 年第 2 期（总第 212 期），第 47 页。

[8] 贺红英：《夏伯阳：一种“苏维埃神话模式”的确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9 年第

电影公映30周年之际，苏联当局对其进行修复后又重新搬上荧屏。苏联当局又开始将恰巴耶夫树立成苏联的大英雄，不断地对国内战争进行神话般的赞扬。苏联官方宣传机器的出发点不是取决于历史真实，而只是树立起一种个人崇拜观。

事实上，苏联民众已经多次看过这部电影，恰巴耶夫的形象已经深深扎根在民众的心中，甚至连小孩子都经常说起电影当中的片段。苏联当局大张旗鼓的宣传最终又是事与愿违。在民众的口中，恰巴耶夫开始遭到炮轰，已由大英雄成为一个令人十分厌恶的小丑。（笑话①—⑨）

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的脚比我的还要脏。"
"别其卡，我年龄比你大啊。"[1]

②别其卡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在浴池里洗澡。别其卡正在用丝瓜络给他搓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就是你说的几周前被偷了的那件体恤衫吧。"[2]

③阿娜搬进了新房子里，因此邀请恰巴和别其卡去暖房。她告诉恰巴耶夫，"乘93路车去"。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没有出现。第二天早上，别其卡已经喝过了醒酒汤，然后乘车回家，下车后碰到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恰巴耶夫大声喊道，"你来得正好，已经走了92趟车了，下一辆我们就可以乘车去阿娜家了。"[3]

④恰巴耶夫再次试图去考军校。
"怎样？一切都好吧？"
"不是全部，别其卡。我通过了尿检和粪检，但是没通过数学。"[4]

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能喝一升酒吗？"
"当然能。"
"那两升呢？"
"也没问题。"
"一整桶呢？"
"那不行，别其卡。那只有伊里奇可以。"[1]

2期（总第212期），第47、48页。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7.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7.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8.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8.

⑥当地的共青团组织学生去拜访内战老兵。他们介绍了一位最后见到恰巴耶夫活着的老兵。组织者让老兵讲一下他与恰巴耶夫的历史性会晤。

那老兵开始讲他的故事。"我手里拿着一架马克沁重机枪爬上河流上游的一个山脊时，我看到了恰巴耶夫。他正在试图游过那条河。我向他扫射了一阵，但他潜入了水中。当我看到他浮出水面时我又向他扫射了一阵。孩子们，这就是我最后见到的恰巴耶夫。"[2]

⑦在革命博物馆里，向导向人们介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巴耶夫的骨架。

"那他旁边那架小骨架是谁的？"一个游客问道。

"那是恰巴耶夫小时候的。"[3]

⑧"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他们说你申请签证去以色列。"

"嘘，别其卡……"（用意第绪语说道）[4]（意第绪语属于日耳曼语族，使用该语的大部分人是犹太人。在苏联 20 年代被视为犹太无产阶级的语言加以推广，但随之反犹主义在苏联的盛行，逐渐被取缔。——笔者注）

⑨别其卡带着抢劫来的低音提琴正在游过乌拉尔河。

"恰巴耶夫在哪儿？"富尔曼诺夫远远地在岸边接应他。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抢得了一架三角钢琴，他已经沉入河底了。"[5]

三、官方对施季里茨的过度渲染

施季里茨是苏联作家尤里安·谢苗诺夫[6]在小说中塑造的最出色的人物形象，原名为伊萨耶夫，是苏联的高级间谍。他先后出现在谢苗诺夫的多部作品中，例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宝贝》(1974—1989)、《无需密码》(1965)、《旋风少校》(1967)、《春天的十七个瞬间》（1968)、《命令你活着》（1982）等等。施季里茨在小说中是集忠诚、勇敢、机智、敏捷于一身的苏联英雄人物，总是在身处十分危险的境地中巧妙地逃出敌人的包围，完成党交给他的潜伏任务。1973 年，由塔吉扬娜·利奥兹诺娃[7]执导、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夫斯基·吉洪诺夫[8]主演的 12 集同名系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9.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9.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9.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0.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1.

6 尤里安·谢苗诺夫（1931—1993），苏联作家、电影剧本作家。

7 塔吉扬娜·利奥兹诺娃（1924—2011），著名的电影导演。

8 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夫斯基·吉洪诺夫（1928—2009），著名的前苏联和俄罗斯电影演员及导演。

列电视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出现在苏联公众面前，获得民众的广泛喜爱。电影讲述的是发生在 1945 年春 17 天里的故事，已成为德国党卫队旗队长的苏联高级间谍施季里茨长期潜伏在德国，调查德国高层官员同西方媾和的阴谋，他同敌人斗智斗勇，最终胜利完成党交给他的使命。“对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观众来说，关于施季里茨的电影某种程度上就像对于我们的詹姆斯邦德或者夺宝奇兵系列的电影。这类电影既刺激又有趣，但当电影结束时，观众们就会嘲笑英雄那荒谬的逃跑以及超人般的观察力、洞察力和敏捷力。坏人总是如此的愚蠢吗？”[1]尽管当时苏联不少民众也很崇拜施季里茨，尤其是年轻人更是梦想能成为施季里茨那样的英雄人物。但是爱开玩笑者还是把他当做官方的宣传工具加于愚弄。（笑话①—⑥）

①施季里茨走向窗口，朝窗帘叹了一口气。那一刻他想做回伊萨耶夫上校了。[2]

②施季里茨收到一个编码电报：“你妻子生了一个孩子。”一滴眼泪从他的脸颊滑下来，他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了。[3]

③盖世太保告知施季里茨如果再不支付电费的话，他们就要关闭他的无线电发射器。[4]

④总参谋部的官员们正在开会。通讯员进来说道：“先生们，星期四每个人都必须得汇报一下蔬菜的收获状况。”
施季里茨在膝盖上拍打着：“去你娘的，这跟在苏联一样……”
缪勒：“施季里茨真是老谋深算啊，做苏联间谍仅仅是为了逃避收缴蔬菜啊。”[5]

⑤元首给施季里茨把勋章戴好。
“祝贺你，旗队长……”元首微笑着伸出手。
“为苏联服务！”施季里茨响亮地回答道。
“……”元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施季里茨意识到自己可能暴露了。[6]

⑥当天午夜，苏联情报总局接到了柏林的绝密电报：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1.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2.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2.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2.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22.
[6] 《苏联冷笑话：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3811bfbb1a37f111f1855b7a.html .

阿历克斯：

请立即查明在帝国保安总局六处工作的冯·施季里茨的背景。[1]

[1] 《苏联冷笑话：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3811bfbb1a37f111f1855b7a.html .

第四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制度性层次

第一节 政治体制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关于政治体制的苏联政治笑话实际上是涉及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核心，即苏联的干部体制。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该类政治笑话主要是突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干部体制的缺陷和弊端，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首先就对干部政策进行了调整，废除了赫鲁晓夫时期令官员们心慌的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把“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贯彻到苏联的干部体制上，事实上恢复了苏联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如果说赫鲁晓夫给苏联骨干带来了生命安全这一礼物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保证了他们职务的安全。苏联的高级官员不是逐步消失，而是死在任上。”[1]

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第 25 条中明确规定：“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四分之一，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至少更换三分之一；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2]到 1966 年苏共二十三大上，勃列日涅夫却指出：“近年来所实行的对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的频繁地改建和改组，对挑选、提拔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通常，跟着这些做法一起发生的，就是没有道理地重新安置干部和更换干部，使工作人员因而缺乏信心，妨碍了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为不负责任提供了土壤。”[3]随之修改后的党章中只保留了原则性的条款，而去掉了 1961 年党章中关于干部制度的“硬性条款”。“鉴于许多党的机关和共产党员的建议，考虑到党内选举时

---

[1] 【美】赛维林·比亚勒著，普尔译：《苏联的稳定和变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6 页。

[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 457 页。

[3]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二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 122 页。

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及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经常会更换党委会的成员，并且考虑到在这些问题上所做的规定经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在苏共章程中继续保留那些规定更新和更换党的机关成员和党组织书记的比率的条框是不合适的。因此，取消党章第二十五条。对第二十四条作如下补充：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党的机关的成员要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1]

这种稳定的干部政策，“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2]以苏联的中央委员为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次苏共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比例不断攀升，苏共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比例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最低的，却也高达 79.4%。“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 15-20 年之久。”[3]为了贯彻稳定的干部队伍政策，苏联当局甚至想出了“一套很高超的保护十分无能的官员的办法”：“如果发现州委书记在本州应届选举中有可能落选，就把他调回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视察员职务，两三年之后又推荐他（实际上是任命他）到另一个州去担任州委书记。不称职的部长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或者‘为他’建立某个新的部。为完全垮掉的干部寻找或建立清闲但待遇优厚的职务，往往派到某个国家当大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谁如遭失宠，往往派去担任此种工作）。”[4]

最终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行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必然导致领导队伍老龄化，出现了老人治国、甚至是病夫治国的局面。到 1980 年，苏联关键机构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超过了七十岁，“政治局七十岁以上的人比六十岁和六十岁以下的人多六倍，部长会议主席团则多四倍”。[5]基里连科在七十寿辰接受国家最高勋章的讲话中说道：“人生七十不算短暂，但同时也不很长。好在在我们国家里，人们把七十岁只看作是中年呢。”[6]安德罗波夫在孔采沃医院住院期间为庆祝自己

---

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版，第 329 页。

2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01 页。

3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09 页。

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09 页。

5 【美】赛维林·比亚勒著，普尔译：《苏联的稳定和变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4 页。

6 【美】赛维林·比亚勒著，普尔译：《苏联的稳定和变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0 页。

生日时写的一首诗中更是道出了病夫治国的力不从心："哦！至高无上的神用手，为我指定了悲哀的道路起点，起点就在这里，在医院里，它简短的称呼就是心肌梗塞。这是一条每走一步都不知去向的路，在这条路上心脏受着考验，引导我们'通过荆棘走向胜利'，也许一下子就可去见祖宗。"[1]（笑话①—⑦）

①苏斯洛夫快死了，政治局委员正围在他的床边。他们正在等着医生宣布苏斯洛夫死亡。沉默很久后，医生开口说道："没办法啊，没有人能顶得住。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老年化。"

"不对，"勃列日涅夫说道，"我们主要的敌人是缺乏自律。大家看看，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但苏斯洛夫还没来。"[2]

②"波德戈尔内为什么被开除了？"

"因为他在勃列日涅夫的生日上赞扬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你现在 70 岁，看起来比 60 岁的苏联政权还要好。'"[3]

③"1982 年我们有什么梦想？"

"苏联政权已经 65 岁了，或许应该退休了。"[4]

④"世界上最有趣的老人之家在哪里？"

"克里姆林宫。"[5]

⑤"有 40 颗牙齿和 4 条腿的是什么？"

"鳄鱼。"

"那有 4 颗牙齿和 40 条腿的是什么？"

"苏共政治局。"[6]

⑥"这些天勃列日涅夫每天都有什么安排？"

"上午 9 点：复活。上午 10 点：静脉注射早餐。上午 11 点：为工作餐作准备。上午 12 点：工作餐。下午 1 点：卸下奖章。下午 2 点：被授予新奖章。下午 3—5 点：休息一下。下午 6 点：为工作餐作准备。下午 7 点：工作餐。下午 8 点：临床

---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1 页。

[2]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4.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4.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6.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6.

死亡。第二天上午 9 点：复活……”[1]

⑦一天早晨，有家晨报报道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沉痛地宣告：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在长期患重病后没有苏醒过来，但是目前任在工作。”[2]

二、任人唯亲的任命制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于干部的任免仍旧实行委派制，而高层领导干部的选用更是实行“绝对的任命制”。自 1952 年起，苏共中央书记处担负起选拔、考察以及任免高层干部的决定性大权。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进一步扩张。勃列日涅夫在总结二十五大后党的工作时曾指出：“挑选干部、组织工作和检查执行情况，还有党的生活中的几乎一切日常问题，基本上都是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范围。”[3]苏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总书记领导的，因此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掌握着高层领导干部的生杀大权。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集权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导致选拔干部存在着任人唯亲的现象，而且非常严重。在苏联领导最高层，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在任免高层官员上就是占有任人唯亲作风的典型。“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 •伊里奇本人的关系……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4]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他就不断地把自己的人提拔到主要的领导岗位上，比如以他为中心形成的“第聂伯罗帮”。至于他的亲戚、朋友更是凭着他的权力平步青云，他的女婿、儿子、弟弟都迅速地跃升到副部长级别就是很好的例证。“甚至远方亲戚，亲戚的亲戚，他们的朋友也都没有被遗忘。”[5]这种不正之风不仅仅表现在勃列日涅夫一人身上，上行下效，全国都弥漫着任人唯亲的作风。“这种干部任命上的不正之风自上而下地传染到全国，干部要提拔主要靠关系，靠个人的忠诚，靠亲属的条件，而不靠业务和政治才能。”[6]最后，干部任命体制合乎逻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5.

[2]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13 页。

[3]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于苏联剧变——20 世纪 60—90 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0 页。

[4]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03 页。

[5]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42 页。

[6]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于苏联剧变——20 世纪 60—90 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M】，北京：当

辑地发展到阿尔巴托夫称之为“特权继承制”的地步：“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1]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任人唯亲的任命制只能导致出现以下局面：“领导人的水平直线下降，因为现有的政治机制没有保障真正良性的自然淘汰。实行的是某种‘反向的自然淘汰’，提拔了一些平庸的、无能的、往往不正直的人。”[2]

一位老将军和他的孙子正在散步。

“爷爷，我长大后能当上将军吗？”

“当然能。”

“那我能当上元帅吗？”

“那不能，元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孙子。”[3]

三、特权制度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干部制度的另一个重大调整就是加强了“官员等级制度”，使特权阶层不断扩大化和稳定化。各级领导干部开始从“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4]引起的震荡中逐步恢复过来，“与荣誉相联系的终身制，享受高生活水平和各种特权”，[5]这事实上宣布了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实行的“反特权”运动的失败。

这种特权制度“先是各共和国及其领导人，接着是州和市，某些方面是区，甚至是工厂和农庄都纷纷效仿”。[6]特权阶层主要是由各级党政干部组成，“人数约在 100 万左右，加上他们的家属，大约有 400 万人”。[7]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曾对停滞年代特权阶层的奢侈及其心态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如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

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5 页。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10 页。

[2]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19 页。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7.

[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13 页。

[5]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09 页。

[6]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40 页。

[7]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于苏联剧变——20 世纪 60—90 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8 页。

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就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1]在停滞年代里，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有时候只是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和严重桎梏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大，而对最高领导人层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们心安理得地提前享受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现在需求的胃口是那样大，以至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2]（笑话①—⑤）

①“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一切都很富足，”党的宣传员说。
“那我们如何呢？”大厅里有人问道。[3]

②“为什么不再多买点麝鼠帽？”
“因为麝鼠成算术数级繁殖，但是显贵们却成几何数级增多，现在没有人可以再捕猎到麝鼠了。”[4]

③在高加索的一次宴会上，主持人站起来祝酒说：“我提议为勃列日涅夫同志干杯。但是，我要做些解释。我并不是因为他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项职务有工资。我也不是因为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个职务有第二份工资。我甚至也不是因为他是国家第一元帅而为他干杯，他担任这项职务还有第三份工资。我是为他第一个认识到现实状况下靠一份工资难以维持生活而干杯。”[5]

④“不够尺寸的裙子叫什么？”
“叫米尼卡特（短裙）。”
“不够尺寸的小汽车模型呢？”
“叫米妮卡（小汽车）。两种都是时髦货色，虽然东西小，价钱可是大！”
“那我就明白了。一天不干多少活，可是薪水很高的人就叫米尼斯特（部长）了。”[6]

---

[1]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2]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8.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7.
[5]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页。
[6]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年版，第2页。

⑤外国人说："你们喝不到白兰地，真遗憾！"

工人说："不，我们已经通过政府官员喝到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代表呀！"[1]

第二节 经济体制

关于经济体制的苏联政治笑话实际上是涉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该类政治笑话历来在苏联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占有一定的分量。需要指出的是，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该类大多政治笑话都已在苏联社会上反复流传几十年了，对当时民众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风趣了，但却依然具有生命力。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该类政治笑话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

一、行政指令性经济政策

1968 年苏联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之后，在意识形态上掀起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运动。1969 年 12 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标志着，"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不再停留于理论和学术争论的层次，而是进入了由官方组织进行批判的阶段"。[2]苏共二十四大之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进入高潮。[3]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柯西金曾谈及："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示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作用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4]尽管柯西金在报告中也提及了商品货币经济，"但很明显，这一切都是为指令性计划服务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能取代集中计划的主导作用的"。[5]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指"指派给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更大作用；为涉及更'科学'的任何种类和期限的计划而做的努力；为实现技术进步与改进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率而更具体细致地制定计划所作的尝试；数学模式和计算机（包括投入、产出法）的应用。"[6]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家甚至可笑地，"指望国家计委引进计算机乃至超超级计算机，以便在中央进行全部统计，并且不但从中央指挥每一个企业的工作，而且还指挥每一

---

[1]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3 页。
[2]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10 页。
[3]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11 页。
[4]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 年版，第 214 页。
[5]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11 页。
[6] 【美】约翰·P·哈特等著，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复旦大学经济系等译：《苏联经济现状：提交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论文汇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年版，第 27 页。

个车间、每一个工段的工作”。[1]即使在 60 年代中期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简单的调整，更何况自 70 年代初开始这种经济上简单的调整政策也被停止了。

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经济体制上并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依然实行行政指令性经济政策，靠强制性的行政法规、条例、命令等行政措施来掌控经济的运行和加速农业和工业生产的集中。例如，上级机关层层向下级下达命令、指示、指标，“向农庄、农场下达播种计划、牲畜头数，有时甚至闹到向农庄下达母猪交配任务的荒谬程度”。[2]随着苏联经济管理机构的日益臃肿，这更导致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 1965 年的 29 个增加到 80 年代初的 160 个。这些部门主要通过布置各种计划指标和下达文件的方式进行领导。据统计，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其他各种法规竟达到 20 万种之多，它们几乎为企业全部活动规定了详尽的细则，使地方和企业不敢也无法越雷池半步。”[3]

这种行政指令性经济政策的加强往往使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种共识：“大家最喜欢的衡量成就的一个标准就是百分之百的完成计划。但是实际上这个百分之百又能说明什么呢？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不过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花招，同社会的实际需要完全不相干。这种方法也从不说明这个百分之百是用什么代价获得的。”[4]实际上，各级下达的行政指令性经济计划总是不能完成，人人都“生活在人为想象的和其他假设的环境中”，“从工作面的虚报开始的，而且更是从企业、农场和农庄的虚报开始的”。[5]（笑话①—②）

①有位外国记者问勃列日涅夫：“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么大国家的供应问题的？”“这很简单，我是通过使全国集中化的办法解决的。首先把所有的产品都运到莫斯科来，各地居民再从莫斯科分得一份。”[6]

②某集体农庄的老母猪生了 3 头小猪，为此农庄党委会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上报的问

---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20 页。
[2]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9 页。
[3]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97 页。
[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97 页。
[5]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97 页。
[6]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09—310 页。

题。与会者认为虽然只生了 3 头，少了点，但是总比没有好。他们经过研究后决定向区党委报告说生了 5 头小猪。区党委分析了农庄的报告，决定向苏联农业部报告说生了 7 头小猪。农业部经过考虑后决定向苏共中央报告说："已经完成了本季度生产 20 头猪的任务，并且是提前完成的。"党中央经过考虑后决定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国家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 25 头猪的生产任务。"

"这太好了！"勃列日涅夫颇为高兴。他想了想，然后下达指示说："请按照以下方案分配：3 头猪拨给英雄城市列宁格勒的工人，3 头给英雄城市莫斯科，5 头用于出口，5 头援助非洲饥饿儿童。剩余的用于战略食品储备，不得分给任何人！"[1]

二、短缺经济

短缺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居民的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同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和服务的缺乏和供给失调的矛盾而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往往导致短缺经济的出现，并以排队、黑市等形式表现出来。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的突出表现就是短缺经济，"结果造成 75 年来商店一直排着长队，商品普遍匮乏。到共产主义末期，排队买食品的时间比生产食品的时间还要长"。[2]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众的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不断提高。"苏联的公民，无论地位高低，物质上的需求和愿望的提高，已经非常惹人注目"，"一阵唯物主义狂热征服了苏联所有阶级和阶层居民，一阵捞取商品、追求生活与享受的风气席卷全国"。[3]农民、工人的收入不断增加，"从 1965 年到 1980 年，集体农庄的月工资平均收入由 40 卢布增加到 118 卢布，增加了近 2 倍"，[4]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也大幅度缩小。尽管苏联民众的消费需求和购买能力得到了不断的提高，但该时期苏联的经济却进入了"停滞"阶段。从 70 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到 80 年代初"几乎临近经济停顿的程度"。[5]大部分年份粮食产量下降，"1979 年—1982 年，出现连续四年歉收"。[6]自 1973 年起，苏

---

[1]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20—321 页。

[2] 【美】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著，白洁等译：《俄罗斯重振雄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2 页。

[3] 【美】赛维林·比亚勒著，普尔译：《苏联的稳定和变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23 页。

[4] 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于苏联剧变——20 世纪 60—90 年代苏联各社会政治阶层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71 页。

[5]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4 页。

[6]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81 页。

联“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并且对这种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1]自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经济结构不断失调，乙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非常长，“一项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长达10—12年之久”。[2]

从7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短缺经济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开始主要是一些耐用消费品和进口商品的供应不足，“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皮鞋、家具、电视机的生产计划，年复一年地没有完成。在质量、装潢、品种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3]当时苏联的石油产量在世界上占第一位，但在国内的”燃料也不足”，“在航空运输中每年都发生严重混乱”，而对于苏联“拥有的数量不算大的汽车”来说，“汽油也不够”。[4]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短缺现象已经升级到日常必需品的匮乏，并且日益严重。莫斯科和其他的大城市开始实行食品的限额配制，“一些普通食品如肉、奶、黄油等，开始从柜台上消失，尤其是小城市和农村”。[5] 葛罗米柯常常在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大喊道：“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城市没有肉卖啦！”[6]苏联民众一听说哪个地方或某个商店刚进了某批货，他们便放下手边的工作，迅速地跑过去，开始排队等候。“外地人来到莫斯科要花几个小时排队买进口的靴子，或者是香肠。这时，一边站在长龙似的队伍里，他们一边对莫斯科人感到嫉妒和气愤，心想，这些莫斯科人的生活多么幸运啊，简直应有尽有。而莫斯科人对那些挤满所有首都商店的外地人也感到反感，抱怨因为这些外地人来了，莫斯科人才买不到东西。”[7]除了短缺经济造成的排队购物现象外，在那个时候，还出现了“黑市”。一些有门路的人往往与商店的熟人或经理勾结，投机倒把，低价从商店买出货物，然后以高价在“黑市”上卖出，“商

---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2]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3]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5]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6]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7]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75—76页。

店里空无商品，商品不是去买到的，而是去‘搞到’的”[1]。叶利钦听说商店运来了一批小牛肉，终于轮到他时却被售货员告知“没有小牛肉”，他找到经理，然后去看小仓库时发现，“小牛肉就放在那儿的一间屋里，并正准备从‘后门’卸走”。[2]一家工厂的员工抱怨食堂里没有红萝卜，结果调查才知道“来过货，但当天又不知运往别的什么地方了”。[3]“鞋子和蛋糕，衬衣和书籍，汽车和洗衣粉，电视机和药品，都需要人们去‘搞到’。人们向往着‘搞到’进口的录音机和避孕用具。”[4]（笑话①—⑨）

①“请问，你从哪儿弄到的厕纸？”
“我去干洗店干洗了一下，然后再重新用。”[5]

②一位在《真理报》工作的热心的年轻记者被派去采访村民。他的工作就是以教育性的谈话来向村民宣传党对国际事件的路线、政策。一晚上的谈话后，他又像往常那样请别人提问题。如往常一样没有一个人提问题。他最后作总结，“我们在《真理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觉得我们还应该怎样改善报纸以便更有益于你们？”大厅的后面传来声音，“再少用点墨水。”[6]

③有个工人问：“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国家正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路上，但是到处都缺乏供应，人民没有什么吃的，这如何理解？”
勃列日涅夫答：“是谁答应在路上供应吃的啦？”[7]

④两副骨架在墓地里相遇了。
“你是死于食品供给计划前还是在此之后？”
“我还活着呢。”[8]

⑤“食品供给计划后怎么样？”
“还有一群幸存的人。”[1]

---

[1] 【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页。
[2]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3]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4] 【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页。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5.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5.
[7]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8]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3.

⑥“拉比诺维奇，你为什么想去以色列？”

“我厌倦了所有的假日。”

“什么假日？”

“买一些香肠，有假日。买厕纸，也有假日……”[2]

⑦特拉维夫市新开张了一个俄罗斯餐馆，名叫“怀旧”。如果你去这间餐馆，食物是坏的，服务更糟糕，并且他们要价很贵。当顾客离开时，服务员对顾客喊道，“倘若你不喜欢这里，犹太佬，你为啥不去以色列？”[3]

⑧在勃列日涅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为什么苏联缺乏肉制品？”

“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正在突飞猛进地奔向共产主义，而牲畜的生长却跟不上我们！”勃列日涅夫明确地回答。[4]

⑨“当我们到达共产主义后，我们将怎样解决排队购物的问题？”

“到那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让你排队购买了。”[5]

第三节 对外政策

自赫鲁晓夫时期以来，苏联政治笑话制度性层次的目标对象扩大化的表现就是对外政策方面。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上流传着越来越多的该类政治笑话。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关于对外政策的苏联政治笑话主要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更加重视对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采取短暂的“较为宽松”的政策之后便开始加紧对东欧各国的控制。首先，勃列日涅夫逐步抛出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将其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理论，从意识形态上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密不可分和苏联在保护大家庭的团结上所负有的主导性义务。勃列日涅夫在对外讲话中多次强调：“我们的时代是革命风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3.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7.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7.

[4]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11 页。

[5]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10.

暴的时代……巩固作为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堡垒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1]1965 年 7 月 3 日，他在克里姆林宫苏匈友好大会上甚至赤裸裸地说道，“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心态”。[2]勃列日涅夫主义实质上是表明：东欧各国应该遵循苏联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否则苏联将不惜采取武器方式来进行干涉。其次，苏联采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措施来控制东欧各国，定期召开共产党、工人党书记会议，加速东欧军事、经济一体化进程，“连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免都是在苏联的授意下进行的，东欧国家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东欧国家在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必须和苏联步调一致”[3]。1968 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和 1981 年苏联对波兰国内局势的干涉便是该时期苏联加紧干涉和控制东欧各国的典型表现。（笑话①—⑩）

①1968 年苏修侵捷后，苏捷之间签订了苏军“暂时留驻”捷境的条约。
时隔数年，苏修占领军仍然赖着不走。
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问另一个本国人：“你知道暂时是什么意思吗？”
回答说：“在俄文字典里，暂时就是比永久少一天。”[4]

②勃列日涅夫在理发的时候，理发师一直问他一些关于波兰的问题。最终烦乱的勃列日涅夫打断了他：“你为什么不停地问我关于波兰的问题？”
“这样有利于我工作。每次我问你的时候，你都怒发冲冠。”[5]

③ “你知道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吗？”
“那还不知道！它是一辆摩托车，但是方向盘却在莫斯科。”[6]

④有个捷克人在街上遇见了边防部队当军官的朋友，问道：“你们工作忙吗？”他的朋友摇摇头说：“你知道，我们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没有国界的国家，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7]

⑤“苏联和捷克之间是朋友还是兄弟？”

---

[1]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二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 223 页。
[2]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一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 74—75 页。
[3]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57 页。
[4]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15 页。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2.
[6]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21 页。
[7]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21 页。

“当然是兄弟。朋友是彼此自愿选择的。”[1]

⑥有人问苏联占领军士兵：“你们为什么要来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堂而皇之地回答：“我们是根据你们的请求而来的。”这个捷克斯洛伐克人恍然大悟地说：“对！对！我们曾在 1938 年请你们来，但你们却在 30 年以后来了！”[2]

⑦“苏联军队为什么呆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久？”
“他们任然在寻找是谁要求他们来帮忙的。”[3]

⑧塔斯社宣布：“签署苏捷关系正常化的苏联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同志）、格列奇科（国防部长）和 T-64。”[4]

⑨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罗马尼亚人在苏联访问时到一位苏联朋友家去做客，他们发现这位苏联朋友家里没有小汽车，就问：“你们家里怎么没有汽车？”这位苏联朋友说：“我们有地下火车。”美国人又问：“那你们走访朋友怎么办？”旁边的罗马尼亚人插话说：“苏联人访问朋友是坐坦克去的。”[5]

⑩苏联的共产主义是镰刀、锤子加金星。他们也是把这种共产主义给了我们波兰。你看，用镰刀卡住了我们的脖子，用锤子锤我们的头，那眼睛里可不全冒金星吗？！[6]

二、中苏关系继续恶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苏中关系采取虚伪的“两面性”方针。一方面，在多次会议和讲话中，勃列日涅夫不断重申，“我们应该始终不渝地继续谋求解决分歧、加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以及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途径”。[7]而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苏联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时期苏中关系的方针。在 1964 年 11 月 7 日米高扬同由周恩来率领的访苏代表团说道，“我们丝毫不会放弃自己原先的政治立场”。[8]事实上，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层内部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态度也并不统一。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谢列平等人对改善和加强苏中两国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3.
[2]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16 页。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3.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4.
[5]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16 页。
[6]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19 页。
[7]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一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 323 页。
[8]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49 页。

的团结表现得很积极，而勃列日涅夫却“大部分时间是默不作声，或是察言观色，等待观望”，“当柯西金开始向他逼近，要求他去访问中国时，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含糊地说：‘如果你认为非去不可，那你就自己去吧’”。[1]在这种对中方针的指导下，苏联“不正确地、过高地估计来自中国的威胁”。[2]于 1966 年 1 月和 1978 年 11 月苏联分别同蒙古和越南签订了《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远东集结百万多兵力，这也使中国更加警惕起来，最终致使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甚至“在达曼斯基岛及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3]。“这时说的已经不是理论上的分歧和争论，而是两个大国间关系日益紧张的冲突形势。”[4]（笑话①—⑤）

①勃列日涅夫做了一个恶梦：在莫斯科红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正在用筷子吃未发酵的面包；中国人像以色列人那样善于打仗；谁会像中国人那样善于生孩子。[5]

②勃列日涅夫通过电话热线告诉尼克松他做的梦：一面红旗在白宫上飘扬。
第二天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告诉他他自己做的梦：一面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飘扬。
“这本来就是真的，”勃列日涅夫说，“在克里姆林宫上本来就飘扬着一面红旗。”
“那面旗上写了字，”尼克松说道。
“上面写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懂汉语。”[6]

③“2000 年，一瓶伏特加值多少钱？”
“5 元。”[7]

④现在苏联学校学两种语言，学意第绪语以方便那些想离开苏联的人，学汉语以方便那些呆在苏联的人。[8]

---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0 页。
2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83 页。
3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3 页。
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40 页。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2.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2.
7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2.
8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⑤卡特和葛罗米柯从对面各自的房间里走出来，进入了另一间房子。

“我们终于彻底裁军了。”卡特说。

“是啊，我们最终可以完全信任彼此了！”葛罗米柯应道。

“谈得够多了，请回到你们房间里面去吧！”一个中国人守卫说道。[1]

三、加紧在第三世界的扩张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更加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在苏联外交政策上的战略意义。自70年代以来，苏联不断加强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相比赫鲁晓夫时期而言，“这次是全面开花，包括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科学技术等”。[2]

苏联加紧对第三世界的扩张是在打着传统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口号下进行的。早在20年代初，苏联对外输出革命的失败教训已经表明“社会主义是不能用刺刀赠给别的国家的”。[3]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为了配合它的对外扩张战略，进一步强化“进行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推行“永不停息的意识形态战争”。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说道：“同志们，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正在遭到从民族解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力量越来越大的进攻，首先是亚洲和非洲有反帝情绪的年轻的独立国家的进攻……苏联共产党意识到自己的国籍主义义务，在国际事务中今后仍将奉行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全世界反帝斗争和加强所有反帝队伍战斗团的路线。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而我们将为这一胜利，为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4]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战略的突出表现就是，“全面修改20大决议，回到列宁的革命扩张的理论上来，确认今天进行世界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并强调苏联准备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来支持世界革命”。[5]“苏联的‘缓和’政策就是列宁的‘喘息’政策，而所谓的‘共处’不过是‘积蓄力量’以便最终解决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而已。”[6]然而

Curzon,2005,p142.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2.

[2] 【苏】阿·阿夫托儿哈诺夫著，杨春华、张道庆译：《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3]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4]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七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27页。

[5] 【苏】阿·阿夫托儿哈诺夫著，杨春华、张道庆译：《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6] 【苏】阿·阿夫托儿哈诺夫著，杨春华、张道庆译：《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在该时期苏联推行的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战略实质上是扩张战略，在世界各地与美国争霸，扩大自己的世界影响力。“在解释自己的学说时信口开河，在选择手段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制约，在保卫自己的目的时表现出来的狂热，为了达到它顽固不化的主要理想和政权可以牺牲任何其他理想——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策略学说的特点。”[1]阿尔巴托夫的话倒恰如其分地揭露出该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思想根源：“问题涉及‘革命主义’意识形态残余，输出革命思想的残余，这种残余形成了某种政治主张，认为我们有义务援助解放运动，直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这一政策充满了革命口号，也同帝国野心紧密地交织在一起。”[2]

在以上这种双重思想的指导下，70 年代以来苏联加紧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采取多种措施来扩大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力，“有经援、军援、贸易、外交关系、宣传、文化交流及武力，等等”.[3]从扩张的地域范围看，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侧重点主要是非洲和中东地区以及南亚.其涉及的国家主要与以下一些动机相联系：“第一，要求支持进步的或反西方的政权，例如纳赛尔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后来的南也门等；第二，要求减少一些国家对美国或中国的依赖，比如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第三，其他一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在世界与地区政治事务中有潜在的重要性的国家，比如印度、索马里和埃及等。”[4]在对外援助政策上，苏联开始注重军事援助和武器输出。“从 1970 年到 1979 年，苏联对第三世界军事援助达 474 亿美元，同期的经济援助是 116 亿美元”，[5]其经济援助也开始推行“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6]。苏联联还同第三世界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友好合作条约，“这些条约几乎都带有军事性质，因此这些缔约国无疑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7]到 7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一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开始采取军事干涉的政策。阿尔巴托夫曾指

---

[1] 【苏】阿·阿夫托儿哈诺夫著，杨春华、张道庆译：《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62 页。

[2]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69 页。

[3] 【美】罗伯特·唐纳森著，任泉、刘芝田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 页。

[4] 【美】罗伯特·唐纳森著，任泉、刘芝田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73 页。

[5]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 18 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68 页。

[6] 【美】罗伯特·唐纳森著，任泉、刘芝田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93 页。

[7] 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93 页。

出，“作为开始，是向安哥拉派遣古巴军队，用来支持其中的一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那里燃起的政治军事斗争将决定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撤出后谁来掌握政权。……不仅在政治上支持古巴人，向他们提供武器，而且直接参加向安哥拉运送古巴武装力量，后来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给以广泛的援助，其中包括武器和军事顾问。[1]”“在安哥拉之后，我们沿着这条显得已经踏平的道路大胆前进，实际上是沿着干涉升级的阶梯前进。这些阶梯就是——埃塞俄比亚、也门、一系列非洲国家，最后是阿富汗。”[2]（笑话①—②）

①1967 年 6 月 5 日，“六日战争”爆发。纳赛尔给勃列日涅夫发电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犹太人攻打。救援，苏联。”[3]

②在阿以战争期间，埃及深受俄罗斯的影响。纳赛尔借用库图佐夫对抗拿破仑的战术。他诱敌深入埃及，现在他只等结冰的冬季到来。[4]

---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69 页。
[2]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73 页。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1.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1.

第五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社会生活层次

第一节 重大事件

从目标对象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关于重大事件的苏联政治笑话主要涉及勃列日涅夫遇刺事件、莫斯科奥运会以及贝阿铁路建设。关于这三件重大事件的政治笑话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基本上每件重大事件只有两到三则政治笑话流传于当时苏联社会上。尽管该类政治笑话从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它们却反映出苏联民众对政治事件或重大事件拥有很强的敏感度。一旦出现了重大事件，民众便开始对其议论纷纷，并以政治笑话的形式体现出来。

一、勃列日涅夫遇刺事件

1969 年 1 月 22 日对苏联来说是个十分隆重的日子。这一天数百万苏联民众正聚精会神地通过电视机来收看勃列日涅夫在弗努科沃第二机场隆重欢迎太空英雄的场景的实况转播。“电视摄像机用特写镜头转播着欢迎仪式上受到庆贺的国家领导人一张张微笑的面孔，当然特别突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政府车队正驶向博罗维茨基门，过一会儿宇航英雄救要进入克里姆林宫，隆重的颁奖仪式就要在那里举行”，[2]这是民众听到的最后几句激动的报道。突然电视转播中断了，“约莫过了一个小时，转播才又恢复”，播送的是由波德戈尔内颁发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的仪式，而不是由勃列日涅夫颁发，“无论受奖的人还是颁奖的人都显得有点神不守舍。一个个面色苍白，言辞失常，举动紧张。”[3]原来电视转播中断的那一刻发生了刺杀勃列日涅夫事件。当第二辆高级轿车正驶向博罗维茨基门时，年仅 22 岁的少尉维克多·伊万诺维奇·伊利因手持双枪朝车里射入 16 颗子弹，两人受伤，司机死亡。作为被刺杀目标的勃列日涅夫并没有乘坐该辆车，幸免于难，但却在慌乱中撞到了汽车的挡板上，眉毛被划了。

伊利因出身于 1948 年，俄罗斯人，毕业于列宁格勒测绘学院，他骨子里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在参加政治学习时，他却认为“共青团作为一个组织已经过时

[1] 【俄】尼古拉·津科维奇著，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译：《极端政治——前苏联首脑遇刺秘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94 页。
[2] 【俄】尼古拉·津科维奇著，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译：《极端政治——前苏联首脑遇刺秘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94 页。
[3] 【俄】尼古拉·津科维奇著，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译：《极端政治——前苏联首脑遇刺秘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94 页。

了”；他非常痛恨苏共的一党专制，对 1968 年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持不赞成态度。在 1977 年苏共讨论新宪法草案之际，已在喀山精神病院的伊利因甚至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一份议案，其中提及“如果党和政府推行的政策不符合宪法，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均有权进行恐怖活动”。[1]（笑话①—②）

①“最近媒体上咋没有关于伊利英的消息？”

“政府正在查找他的弟弟，因为他的弟弟说要走另一条道路。”[2]

②大家都在责怪伊利英失去了一次近距离刺杀勃列日涅夫的机会。

“你们不知道，当时大家都抓着我的手臂，说，‘让我来，让我来’。”[3]

二、莫斯科奥运会

在 1974 年国际奥委会第 75 次会议上，莫斯科赢得了 1980 年第二十二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1975 年 3 月，莫斯科成立了奥运会筹委会，开始积极地对奥运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兴建和改造了很多达到了当时世界上一流标准的体育设施。1980 年 6 月 20 日，《真理报》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名为《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设施项目的建筑机构、安装机构、调试机构、设计机构、建筑材料工业企业、建筑工业企业和汽车运输部门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党、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以及参加工程建设的全体人员》的文章，文章提到：“短期内建成和改建了七十项奥林匹克运动会设施，其中许多设施是国内外建筑实践中空前的、独一无二的建筑，包括设有四万五千只座位的大型室内体育场、克雷拉茨基室内自行车竞赛场、第一流的伊兹迈洛夫旅馆综合建筑群、奥斯坦金新建的电视广播综合设施、奥林匹克村等。”[4]其次，还对莫斯科的市容市貌进行了全新的装饰，改善了交通环境。更为让莫斯科市老百姓激动的是，在 1980 年奥运会举行期间，莫斯科市的大小商店都摆满了民众期待已久的各类商品，“苏联人梦想的一切——各种食品、饮料和其他商品看上去应有尽有”[5]。据外电报道，苏联为主办这届奥运会总共耗费了 90 亿美元左右，在这此前的奥运会史上是创

---

[1] 【俄】尼古拉·津科维奇著，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译：《极端政治——前苏联首脑遇刺秘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05 页。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3.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4.

[4] 复旦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六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51 页。

[5] 【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60 页。

纪录的数字。

事实上，1980 年苏联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也是事与愿违，这场浩大的“形象工程”并没有给当时苏联日益衰退的局面赢得国内、国外的声誉。这场奥运会反而使苏联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对内，一方面是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短缺经济持续困惑着苏联，在 80 年代初达到历史上最严重的状况，而在奥运会举行期间，莫斯科大费周折地使整个莫斯科市的大小商店充满了商品，事实上老百姓也买不到，“奥运会闭幕了，短时间的商品供应充足的局面页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排起的长队”[1]；对外，一方面苏联通过举行奥运会来宣扬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苏军却正在阿富汗进行侵略战争，这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下面这则政治笑话便反映出苏联民众对莫斯科奥运会的看法：

“政府承诺 1980 年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真的吗？”

“不是，事实上政府决定主办奥运会。”[2]

三、贝阿铁路

从焦点分析的角度，关于该工程仅有的两则政治笑话实质上还是突出官方机器的过度宣传和宣传中存在的欺骗性。

贝阿铁路（全名：贝加尔——阿穆尔主干线铁路）原先是西伯利亚铁路最初的选线，曾经在 30 年代动工，但自 1953 至 1974 年期间一直处于停工状态。“为了开发远东和贝加尔湖以北西伯利亚边区的森林、石油、矿产等资源，发展边远地区的社会经济，建立远东及太平洋沿岸地区与俄罗斯欧洲部分及至整个欧洲的又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3]苏联当局于 1974 年 7 月正式开工建设阿贝铁路（从乌斯季库特至共青城段长达 3145 公里）。该铁路沿线穿过了大片的针叶林地带、沼泽地和永冻层，地理环境相当恶劣，做工条件异常艰苦，并且实行强制劳动，当时被苏联称为“世纪工程”。贝阿铁路干线是“列宁主义共青团的主要建筑工程”，[4]“兴建这项大工程投入了大量的犯人劳力和共青团员”[5]。

贝阿铁路东线于 1984 年 10 月 27 日竣工，1985 年通车运行。事实上到目前

---

[1] 【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60 页。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6.

[3] 刘重庆：《俄罗斯贝阿铁路建设 30 年》【J】，《世界轨道交通》2004 年第 12 期，第 10 页。

[4]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二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 400 页。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4.

为止，很多配套工程还没有完工，一些建设也还有待进行。但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那个停滞年代里，苏联当局不停地在国内、国外对该项工程进行大肆的宣传和赞扬。自 1975 年起，勃列日涅夫几乎每年都发表关于贝阿工程的重要讲话，每次都反复地对其进行称赞："苏共中央十分满意"[1]、"提前完成了计划和所承担的社会主义义务"、"再次使祖国满意"、"你们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信任"[2]、"忠心祝贺你们在劳动中获得的新胜利"[3]、"在短时间内就在无人烟地区建成了总长五百公里以上的铁路线，并且已经通车了"[4]等等。1972 年 12 月 27 日，勃列日涅夫称赞贝阿铁路是"一项真正的全民工程"，"各工业企业、交通运输单位、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及文化、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纷纷提前完成贝阿线的订货，尽可能充分、尽可能好地满足你们的文化和生活需要"。[5]实质上，勃列日涅夫不停地对贝阿铁路工程进行称赞，最终还是为自己领导的苏共唱赞歌："贝加尔—阿穆尔干线的建筑工和铁路工作人员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取得高指标，是由于工地的党、工会、共青团组织和经济管理领导人以及地方的党和苏维埃机关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妥善地把各劳动集体的首创精神和精力引导到贯彻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上来的缘故。"[6]（笑话①—②）

①勃列日涅夫到 BAM（贝加尔——阿穆尔主干线铁路——笔者注）工程现场去参观，看见数百名穿条纹状服装的囚犯劳力。

"你们好，海员同志们，"他向他们问候到。[7]

②中央委员会给 BAM 管理部打电话：有位美国记者将来参观，你们务必确保记者所到之处工人的食宿看起来都非常不错。BAM 答复说这是办不到的。

领导层妥协道："好了，那就让他到地狱看看吧，然后就让他诽谤我们吧。"[8]

---

[1] 复旦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六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17 页。

[2] 左玲珍、高文英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七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85 页。

[3]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二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 399 页。

[4]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二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 399 页。

[5]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一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41 页。

[6] 复旦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六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17 页。

[7]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4.

[8]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4.

第二节 社会问题

一、政治宣传

针对政治宣传的政治笑话历来也是民众非常擅长的讽刺对象之一，尽管该类政治笑话的数量总体不多，但是却贯穿于整个苏联时期。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该类政治笑话主要是突出官方政治宣传的欺骗性。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方面特权阶层和短缺经济成为“停滞社会”中两大突出特征，而另一方面，苏联当局进一步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宣传。在1967年11月3日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事实上承认苏联已经步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正式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并于1977年载入苏联的新宪法中。“为了实现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苏共在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采取虚伪的、形而上学的态度，用教条主义的说教向广大群众灌输，着力地宣传苏联社会已是多么和谐、协调和统一。”[1]

> 拿破仑复活了，于11月7日来到莫斯科市，看到莫斯科市正在举行庆祝“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阅兵活动。勃列日涅夫邀请拿破仑参观阅兵式。拿破仑没有看坦克和火箭，而是非常感兴趣地读真理报。国防部长小声说道：“尊敬的阁下，看看我们的军事装备。如果你有坦克的话，你就会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2]
>
> 拿破仑回答道：“假如我要有你们这样的宣传工具，没有人会知道我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3]

“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4]这种社会现实与官方宣传之间的极大反差使苏联民众对现实政治失去了信心。工农阶级“不再相信自己是主人的那套说法，更不关心终极产品及其质量”。[5]苏共传统的政治宣传体制已经失去了政治动员的能力，人们对官方响亮的政治口号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激情和崇敬感，反而开玩笑者常借用官方经典的政治口号来对其政治宣传的欺骗性进行揭露和讽刺。（笑话①—⑧）

---

[1] 陆南泉：《走进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

[2]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3]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4]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5]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M】，北京：人们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①自治区党委员会大楼上的标语："不劳动者不得食。"[1]

②苏联各个方面的瘫痪水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2]

③"苏联公民拥有第六感？"
"一种对党深深的感激意识。"[3]

④十月革命前楚科奇人只感到寒冷和饥饿，现在他们感到寒冷、饥饿，还有对党深深的感激之情。[4]

⑤一位楚克奇人从莫斯科访问归来，他向他的家人解释革命是为了什么——"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他终于深深地理解了现在的生活，"我终于知道人民指的是谁了。"[5]

⑥ "我们说列宁，指的就是党；我们说党，指的就是列宁。
这五十年来，我们说这件事，指的就是那件事。"[6]

⑦"列宁死了，但他的身体永垂不朽。"[7]

⑧"咱们和英国在民间故事方面有什么不同？"
"英国民间故事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咱们是以'不久的将来……'开头。"[8]

二、移民和外逃现象

从目标对象的角度看，关于移民和外逃现象的苏联政治笑话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出现的，这也是苏联政治笑话转向注重社会生活层次的突出表现。该类政治笑话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的社会生活层次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数量最多，且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移民和外逃现象兴起的原因、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形象的揭露。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关于移民和外逃现象的政治笑话主要是突出苏联民众对苏联政权的离异感，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7.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09.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1.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1.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2.
[6]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08.
[7]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13.
[8]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1、犹太移民运动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将反犹主义认定为“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变种”，[1]使反犹运动成为当时一种既定的“反犹政策”。这更使在苏犹太人遭到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对苏联犹太人而言，他们历来就受到苏联当局和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在苏联是处于被监视和排斥的特殊少数民族，“‘一出问题就怪犹太人’几乎已成为一部分俄罗斯人的一种固定的思想模式”，[2]这使得在苏犹太人对当局的民族政策非常敏感，经常处于恐慌当中。

自 1964 年苏联“第一次批准了 4667 名犹太人移民以色列”[3]以来，更多的在苏犹太人期望移民他国，到 60 年代末逐渐形成了犹太移民运动。而整个 70 年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犹太移民运动的高潮，“在 1971 年至 1981 年期间，一百万犹太人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离开了苏联”。[4]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犹太移民运动分为两个阶段：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是犹太移民的第一阶段，这时期移民的在苏犹太人大都居住于苏联的边缘地区，他们的民族意识较强，苏维埃化程度比较低，往往深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而移民以色列；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是犹太移民的第二阶段，这时期移民的在苏犹太人大部分居住于苏联的中心地区，他们大都在苏联拥有较好的地位，民族意识比较薄弱，他们移民的原因主要是不满苏联的政治、经济现状和受到西方意识的影响，因而大多移民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等。

相对于之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对犹太移民采取了有一定宽容度的政策，每年都允许部分苏联犹太人移民他国。即使这样，“苏联政府还是从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考虑，利用对申请资格、申请费用的规定，以及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适时地调整其犹太移民政策”，[5]实行“限制政策”。因此，被苏联政府拒绝批准移民他国的犹太人更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形成了苏联政治生活中一群特殊的持不同政见者——“犹太移民被拒绝者”。“他们会因申请移民而受到惩罚，因而丢掉工作，而少数人是党员的，会被开除党籍。”[6]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同苏联当

[1] 白玉广、宋正著：《试析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影响》【J】，《史学月刊》2002 年第 4 期，第 93 页。
[2] 唐裕生：《前苏联的反犹政策与犹太移民潮》【J】，《世界民族》1995 年第 1 期，第 40 页。
[3] 【美】泽夫卡茨著，费孝通等译：《苏联主要民族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538 页。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6.
[5] 白玉广、宋正著：《试析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影响》【J】，《史学月刊》2002 年第 4 期，第 94 页。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6.

局进行斗争，期望可以成功离开苏联。“据非官方的调查，1981 年初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约为 4 万。”[1]（笑话①—⑨）

①产科门诊前排了一队人。医生和护士对待犹太准妈妈比其他任何人都认真、仔细。主任医生对一位妇女说：“母亲同志，我们一定要请求你的理解，你是有觉悟的工人。孩子出生后可是要到国外的啊。”[2]

②一个苏联犹太人去民警局申请离境去以色列。民警同他展开了一场对话。

民警：“你对苏联有什么不满意的？”

犹太人：“一切都很好，都很满意。”

民警：“那你为什么要离开苏联？”

犹太人：“不是我要走，是我岳母想走。”

民警：“那就让她走吧！”

犹太人：“我小姨子也想走。”

民警：“那就让她走吧！”

犹太人：“我妻子也想走。”

民警：“那就让她一起走吧！”

犹太人：“不行啊，她们都不是犹太人！”[3]

③一个犹太人递交材料以便申请出境签证。他被问他为什么想离开苏联。

“我有两个原因。在我的社区公寓里，我的邻居不停地告诉我，一旦苏联政权垮台了，他将杀死我和我的家人。”

“但是你应该很清楚，苏联政权是永远不会垮台的。”

“这就是我的另一个原因。”[4]

④“伙计，关于移民我们谈论的够多了。让我们聊聊女人吧。”

“也好。瑞吉儿已经出国了吗？”[5]

⑤这些天，犹太人被分为：那些正在离开的，那些想要离开的，和那些不想离开的。[6]

⑥“聪明的犹太人怎样和愚蠢的犹太人说话？”

---

1 白玉广、宋正著：《试析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影响》【J】，《史学月刊》2002 年第 4 期，第 94 页。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9.
3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13—14 页。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6.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7.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8.

“非常自豪地从纽约打电话过来。”[1]

⑦“勃列日涅夫为什么获得了最后的一枚奖章？”

“从犹太人手里解放了敖德萨市。”[2]

⑧在莫斯科谢德梅吉沃机场，两个犹太人正坐在旅行箱上。广播里播道：“由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要离去，飞往维也纳的航班要推迟一个半小时。”（绝大部分逃亡者都途径维也纳去特拉维夫市或纽约。）

一个半小时后，那广播又发出轻微的啪啪声：“由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要离去，飞往维也纳的航班要推迟一个半小时。”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那广播里又发出同样的通知。如此反复。最后一个犹太人对另一个犹太人说：“你知道 ，海姆，如果他们都打算离开，那我们应该考虑留下来。”[3]

⑨地方的农业指导员正在集体农场会议上讲养鸡的好处。养一只鸡每年都能获得许多的卢布，以此类推。

一个农民打断他，说道：“如果犹太人离开，他们要为他们的教育付多少钱？”

“四千卢布，别打岔，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羊的利润，但又被打断了。

“如果一个犹太工程师离开，他得付多少钱？”

“八千卢布，让我继续讲，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牛，直到又被别人打断了。

“那如果犹太人上过大学呢？”

“两万卢布，但……”

“或许我们最好养犹太人。”[4]

2、外逃现象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越来越多的苏联民众对政权失去信心、对社会感到失望，他们情绪低落，对苏联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例如，名叫里亚波瓦诺夫的一名杂工在给勃列日涅夫的匿名信中写道：“在我们工厂里没有苏维埃政权，采取一切手段迫害详细解释恩格斯、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5]这类人大多对国外生活充满了好感和憧憬，他们非常迫切逃离苏联。

---

[1] 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p211.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8.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8.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8.

[5] 【俄】O.B.埃德尔曼编，方琼、唐福山译：《苏联检察院对 5810 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审查（1953—199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280 页。

有很多人采取自愿放弃苏联国籍的做法。比如，苏联作家、电影编导斯涅吉廖夫出于政治上对苏联社会现状的不满于 1977 年 7 月宣布放弃苏联国籍。1977 年 7 月 29 日斯涅吉廖夫在《放弃国籍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中说道："我不想做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它在自己存在的 60 年里治理无方，以至于不得不把公民副业饲养的牲畜和家禽写入根本法从而使其载入光荣的史册"，"今天是 1977 年 7 月 29 日，我把自己的公民证连同本声明一起寄给你们，从今天起我不再认为自己是苏联公民"。[1]还有一些人通过采取非法越境的做法，从而逃到国外。更有甚者，一些人属于民族主义者，他们期望自己所处的共和国或地区脱离苏联。比如，名叫穆鲁久克的摩尔达维亚人"在熟人中多次表示主张摩尔达维亚脱离苏联"，1966 年 6 月 28 日，"在制糖厂的管道上悬挂了他自制的外国国旗"。[2]事实上，通过非法越境的方式成功逃离苏联的人是极少的，一些人通过自愿放弃苏联国籍和期望自己所在的地区脱离苏联的方式来达到逃离苏联的目的更是异想天开。那些年，"到国外参加巡回演出的苏联运动员、舞蹈家、马戏团表演者、音乐家，以及被政府派遣到国外的苏联人"，[3]他们中经常有一些倒是成功地"背叛苏联"，逾期不归。（笑话①—⑨）

①苏联今年一月（指 1970 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在 1959 至 1970 年的十一年中，全国人口仅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八。若干地区，如俄罗斯共和国，且有人口减少的趋势。

一个记者为此去访问克里姆林宫的有关部门。他问道："部长先生，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国人口增加得这样少的原因么？""那是因为人民不愿生孩子的缘故。"部长回答。

"为什么呢？"记者问："难道不满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吗？"

"唔，绝不，绝不，"部长连忙说道："他们只是感到犹豫而已。"

"犹豫？"

"是的，犹豫。"部长解释道："他们普遍在犹豫，究竟生个社会主义的孩子好呢？还是生个资本主义的孩子？"[4]

②"早安，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有一天早晨太阳对勃列日涅夫说。

---

[1] 沈志华、叶书宗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73—374 页。

[2] 【俄】O.B.埃德尔曼编，方琼、唐福山译：《苏联检察院对 5810 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审查（1953—199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262 页。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9.

[4]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资料组：《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 年版，第 8—9 页。

“早安，可爱的太阳！”勃列日涅夫回答说。

“日安，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中午时太阳又问候了勃列日涅夫。

“日安，可爱的太阳！”勃列日涅夫满意地回答说。

到了晚上，太阳一直未说话，勃列日涅夫急了。就问它：“我说，太阳，你为什么不问我晚安呢？”

“奥，因为我已经在西方了！”太阳回答。[1]

③两只麻雀在苏联边界相遇了，一只打算飞进来，一只打算飞出去。

“兄弟，你来自哪里啊？”

“从西边而来。”

“那边怎么样？”

“糟透了，兄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他们把田里的谷物清理的一粒不剩。你这边如何？”

“这里的粮食你想吃多少就有多少。他们有一半的田野没有收割。”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啊？”

“我想去呼吸新鲜空气。”[2]

④“什么是苏联弦乐三重奏？”

“弦乐四重奏者去国外旅游还没回来。”[3]

⑤“什么叫小剧院？”

“出国巡回演出回来后的大剧院就是小剧院。”[4]

⑥“彼得罗夫大剧院的独奏者和剧院的导演有什么区别？”

“导演可以来来回回，而独奏者只能呆在苏联。”[5]

⑦“苏联为什么不派人登月？”

“政府怕他们不再回来。”[6]

⑧“如果突然有一天他们打开边界，你将干什么？”

“爬树。”

“为什么？”

---

[1] 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18—319 页。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9—140.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4] 盛世良：《苏联政治笑话五则》[J]，《参考消息•上午版》1981 年第 18561 期，第 32 页。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以防被踩伤。"[1]

⑨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索菲亚·罗兰。"我将满足你的任何要求，"他告诉她。

"那请允许所有想出国的人们离开苏联。"

"索菲亚，这是真的吗，你希望只单独和我在一起？"[2]

三、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与社会的离异已经越来越严重，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便是国家与社会的离异升级为矛盾冲突的表现，这一社会现象也没有逃脱出当时爱开玩笑者的视野。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治笑话主要是突出苏联当局强化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监控。

该时期苏联逐步采取了重新斯大林化的方针，强化了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苏联当局对内对外大肆宣传和赞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同时调整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尤其是苏共中央宣传部下设的 13 个局"几乎监管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部领域"。[3]最突出的措施是苏联当局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一旦在这方面出现揭示问题、矛盾的文学、艺术、电影与戏剧等作品，就被视为'离经叛道'并加以批判"。[4]

这一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兴起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成为苏联文化意识形态特别监控和镇压的对象。持不同政见者经常私下地印刷和出版一些小册子和书籍（这些所谓的"地下出版物"被称之为"萨米兹达特"），它们通常都包含有对政权的不满甚至批评的内容，这也是持不同政见者表达自己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化思想的常用工具。"如果说，直接参加运动的人数在苏联人口中占有的比重极小，但是'萨姆—伊兹达特'传播的范围就不是以千计。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5]苏联当局对这类作品是坚决进行查封和禁止的，而对

---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2]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3]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13—134 页。

[4]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12 页。

[5] 【苏】麦德韦杰夫等著，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M】，外文出版局，1980 年版，第 4 页。

持不同政见者往往采用多种手段进行惩罚，“社会隔离、由这方面的专家精组织的污蔑、旨在完全毁坏一个人名誉的密集的指责、打入‘精神病院’、驱赶出国和剥夺公民权利，等等”，[1]比如对亚•伊•索尔仁尼琴的政治迫害。虽然“大规模的政治镇压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但是镇压政策及其执行机关的生命得到了新的延续。时而继续进行逮捕，进行惩罚或者威吓”。[2]尤其是 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国内掀起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潮，苏联当局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措施，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逮捕了。（笑话①—④）

①“列昂尼德・伊里奇，你有什么爱好吗？”
“有，我喜爱搜集关于我自己的笑话。”
“那你已经收集了多少？”
“满满的足有两个半集中营。”[3]（指逮捕了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笔者注）

②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站在广场里，散发传单。人们接过传单走了，发现上面什么都没有写。有一个人又返回来，问那位持不同政见者：“嘿，这上面咋什么都没有？”
“还用说什么嘛？人人都懂的。”[4]

③一位妇女带来一本《战争与和平》的打印本，想让打字员再打印一份。
“为什么？”她问道，“你可以去书店里买这本书。”
“我知道，但我想让我的孩子读这本书。”[5]

④莫斯科的电话交谈：
“你吃完那个饼了吗？”
“我们今晚将吃完它。”
“你吃完后，把它递给博洛迪亚。”[6]

四、其他社会问题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停滞与衰退导致社会问题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尤其是到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社会问题日益严重

---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15 页。
[2]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蔡、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15 页。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5.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5.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5.
[6]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135.

地困扰着苏联政权，社会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从目标对象的角度看，该时期关于社会问题的苏联政治笑话除了涉及前面提及的政治宣传、移民和外逃现象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外，还指向社会日益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盗窃、酗酒和收听国外信息。从焦点分析的角度看，关于盗窃、酗酒和收听国外信息的苏联政治笑话主要是突出苏联民众对政权的失望和无奈。

自 70 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全面停滞和衰退的局面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暴露出来，社会各个阶层对政治、经济的现状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甚至对生活也不再报什么幻想，再也不相信当局所宣称的“不久的将来会更好”的鬼话了。当时苏联各个阶层心中有“一种同玩世不恭态度混在一起的辛酸情绪”，他们不指望当局会通过改革而使局面逐步好起来，反而“他们得出结论，无法改善这个制度，只能把它破坏”。[1]

盗窃现象日益猖狂。农庄、工厂、商店等场所到处都充斥着盗窃行为，已成为当时苏联社会弊端中的一大特征。苏联当局对十分严重的盗窃现象无能为力，有时采取默认放纵的态度。实际上，日益严重的盗窃现象往往与当地的某些官员或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有关，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经常连为一体，侵吞国家财产的现象十分普遍。据报道，“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 110 万卢布，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盗窃的财富达数百万卢布”。[2]（笑话①—③）

①一位农民想申请入党。委员会委员问：“你为什么非法占有两麻袋土豆？”
“不是非法的。我是从集体农场的主席那里偷来的，因为列宁同志教导我们：抢回我们被抢的东西。”[3]

②“苏联有小偷吗？”
“没有，苏联人民都是偷自己的。”[4]

③“到共产主义还有小偷吗？”
“没有，一切东西都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5]

酗酒问题非常严重。据苏联学者统计，“1980 年苏联有 4000 万酒徒，占全

---

[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许葵、张达楠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20 页。
[2] 《人民日报》1975 年 10 月 11 日第 6 版，新华社发。
[3]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4]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81.
[5]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81.

国总人口 2.7 亿的 14.81%”，[1]而且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酗酒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年轻人不到 18 岁便开始酗酒，“在苏联民警局登记在案的酗酒青少年中，40%的人 11—13 岁就开始饮酒，40%的人 14—15 岁就开始饮酒，只有 20%的人 16—17 岁开始饮酒”。[2]不仅如此，女性人群在苏联酗酒的人群中已经占到了十分之一。苏联当局对酒强制征收高额税，例如，一瓶半公斤的伏特加征收的税额就占到售价的 80%，但是这依然挡不住苏联民众对酒的迷恋。（笑话①—②）

①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酗酒是从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桥梁。[3]

②在提高伏特加酒的价格之前，政府在一个工厂做了一项调查。

“如果二十卢布一瓶伏特加酒，你们买吗？”

“买！”

“那四十卢布一瓶呢？”

“买！”

“那要是一百五十卢布一瓶呢？”

“不行，我们的薪水只有一百四十卢布……如果你们提高我们的工资的话，我们也买。”[4]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停止了对外国电台信号的干涉，这使更多的民众开始收听外国电台，特别是青年群体。1968 年 11 月 5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秘密报告”中在关于官方的宣传方面时说道，“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组织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此外，朋友之间总是津津有味地叙述刚刚收听到的最新消息……官方的态度（停止‘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大学生交谈时常常会有这样的话：‘现在《美国之音》在广播……’”，“《美国之音》和《法国浪潮》是最受欢迎的电台，因为他们全天广播，随时都可以听到。听听‘梵蒂冈之声’和‘北京’指示为了几分钟的消遣。在敖德萨‘布加勒斯特’电台很受欢迎，因为他几乎全天用长波播送爵士音乐”。[5]

---

[1] 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68 页。

[2] 张建华著：《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 年第 1 期，第 37 页。

[3]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95.

[4] 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5] 沈志华、叶书宗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1 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一名警察对一名迷路的小孩说：“别哭了。我们将通过电台对你进行广播，很快你的妈妈就来接你回家了。”

“好啊。但你们最好通过 BBC。我的爸爸和妈妈只听那个频道。”[1]

第 148 页。

[1] 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p93.

结语

“与其是讲笑话，毋宁说是历史”，[1]林贤治先生的这句话非常精辟地指出了政治笑话的历史重要性。笔者通过政治笑话的四个结构分析标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笑话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之后，不难看出，该时期的苏联政治笑话从大众文化的独特角度记载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间的苏联历史状况，较为全面且十分深刻地揭露出苏联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日益凸显出的弊端以及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影响，把当时苏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离异程度鲜明地呈现出来。

政治笑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苏联政治笑话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像山洪般爆发出来，使这种影响政治体系的“微弱却普遍的”、“持有异议的”、“隐蔽的、不公开的抗议形式”[2]变成“政治抗议”的一种特殊形式，并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这显然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土壤。

第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停滞社会”客观上为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即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和焦点不断扩大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放弃了改革的机会，反而在“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政治、经济、文化日益步入停滞乃至衰退的局面，社会问题日益严峻。政治上，苏联当局重新加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绝对的任命制，这导致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的出现和特权阶层的不断扩大。经济上，苏联当局进一步巩固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强调行政指令性经济政策在经济的运行和调控中的压倒性作用。农业状况依然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善，并且进一步恶化，经济结构的不均衡性日益严重，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忽视轻工业的发展。这导致短缺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苏联。在文化上，苏联当局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和控制，不断地赞扬不切实际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存在的思想异端进行严密的监视和取缔。在外交上，苏联当局日益采取扩张性对外政策，加强对东欧各社会主义的控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进行扩张和侵略，与美国在世界各地争夺世界霸

[1] 【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卞德清、林笳等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 Ben Lewis:Hammer &tickle,Prospect Magazine,20th May 2006—Issue 122.

权地位。各种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离异越来越突出，最终上升为矛盾冲突，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大量的群众性骚动事件。该时期苏联“停滞社会”的突出表现及其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为苏联民众表达对政权的不满和抗议提供了众多的素材，并通过政治笑话这种大众文化的口头艺术形式把这些繁多的社会现象作为目标对象，通过犀利的、赋有讽刺和夸张的幽默语言来表现对苏联当局的不满和无奈之情。

第二，苏联事实上实行的“指导性政治参与”为政治笑话这种存在着“一定危险性”的政治言论行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所谓“指导性政治参与”是指官方主导下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失去了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和调整的能动性和有效性，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被动的政治参与。在苏联，民众实际上没有合法且有效的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的渠道。尽管从表面上看，苏联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实际上是一种“指导性政治参与”。具体地讲，苏联民众的政治参与都是由官方所主导的，或者恰当地说民众在苏联体制内这种合法的参政途径并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社会利益，更不用说通过该种政治参与来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以及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反而，政治参与却是依赖苏联政权全面的、高度的控制体系来实现的，成为政权主导下的一种“指导性政治参与”。最终，苏联民众的政治参与沦为了政权的利用工具，民众对社会利益表达实际上是无效的。正如亨廷顿所说，“在集权国家”，“广泛的参政可以提高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大众参与政治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众控制政府”。[1]自愿形成的群众运动要合法地表达自己的社会利益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由领导发动并由党进行监督的民主广泛参政是受到鼓舞的”。[2] 苏联存在着各种社会组织，比如控制农村和城市的集体农庄和工会，除此之外，还有共青团、各种兴趣小组以及街道协会和利益协会。“参与这些社会组织的活动不是影响制定政策，而是向国家提供各种服务，并且对政权的主义和政策表示拥护和服从”，“一般民众参政的渠道过于被党渗透并调整，难以对国家的权力起那怕一点点有效的抗衡作用。”[3]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这种“指导性政治参与”的社会动员机制逐

---

[1] 【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2] 【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著，朱曾汶、林铮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63页。

[3] 【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著，朱曾汶、林铮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85、487页。

步失效，“群众的政治热情低落，对国家目标丧失了兴趣，社会和国家间一致性的纽带越来越松。”[1]很多苏联民众开始排斥这种“指导性政治参与”。例如，1979年3月4日，拥有高等学历的B.A.科瓦利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日里，便拒绝参加投票，当选举委员会成员到家里找他的时候，他说，“选举是形式，代表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指派的，报纸上报道有假”。[2]这正印证了以赛亚•柏林的假设之一：“革命最初的心气一过，热情（包括精力）就会减弱，动力也变得不那么强烈和纯粹，对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献出生命和财产产生厌恶，正常的习惯又重新恢复，一开始那种大胆而又傲气的实验气魄将慢慢减退，并最终在卑鄙的腐败和堕落中消失殆尽。”[3]苏联民众缺乏正当的、有效的政治意见表达机制和利益诉求机制，再加上“停滞社会”使民众积压了大量的怨气，这必然迫使他们采取一些行动上或心理上的政治抗议形式来抒发心中的沉闷感，而广大民众采取政治笑话这种心理层次的“微弱的政治抗议”来控诉苏联政权显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手段。

第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众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消极认可为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提供了合理性。从苏联民众的心理取向上看，苏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臣民型政治文化”。苏联大多数民众意识到苏联政权的权威，在情感上取向于它，在评价上也认同苏联政权的合法性，在对苏联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有着高频率的取向性，但在对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自我取向的积极性程度却持着很低的取向性。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苏联传统的社会动员机制的功能失效，再加上苏联的各个方面开始步入“停滞社会”，这使得很多苏联民众对苏联政权感到极大的不满和无奈，甚至抱有怨恨的、敌对的态度。尽管这时候民众还是畏惧表达自我的政治观点要冒着一定的危险性，苏联的国家与社会之间还保持着表面的一致性，但苏联民众心中对传统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已经不再持积极的认可态度，而是持消极性的态度。苏联民众原先的这种主流性政治文化与苏联的政治结构之间越来越不协调，苏联民众在认知的取向、感情的取向和评价的取向上都开始持冷漠甚至是离异的态度。这时候的苏联民众虽然对政治现实持冷漠态

[1]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与社会的离异》【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45页。

[2] 【俄】O.B.埃德尔曼编，方琼、唐福山译：《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1953-199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8页。

[3] 【英】以赛亚•柏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度，但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却越来越具有政治反思意识和政治批判意识，再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人权意识的萌发，苏联民众的政治激情却在不断地增长。苏联传统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开始朝着“臣民—参与型”这种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发展方向迈进。因此，该时期苏联民众持有的对现实政治的冷漠态度与内心激起的政治批判激情较为复杂地糅合在一起，使得苏联民众借助政治笑话这种特殊的政治言论形式论来抨击政治、讽刺政权获得了其发展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政治笑话虽然是一种口头作品形式，与一个国家的民间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根本上还是由其政治体系所决定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日益暴露出其缺点和弊端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肯定会逐步凸现出来，这必然会导致某种社会抗议形式的出现，无论是行动上的，还是如苏联政治笑话这种心理层面上的。可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妥善地处理好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积极性的政治参与机制，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升政权在民众心中的信任度，有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书目

1、南开大学东风红卫兵数学战斗队：《在苏联人民中间流传的一些政治笑话•选编》[M]，天津十八中学“燎原”刻印社翻印，1966年。

2、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化工系统革命造反总部：《流传在苏联街头的政治笑话》[M]，《上海公社》编辑部，1967年。

3、《在苏联流传的政治笑话》[M]，上海市长阳中学教工革命造反大队翻印，1967年。

4、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苏联东欧政治笑话选编》[M]，1975年。

5、沈欣：《西方政治笑话》[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89年。

6、穆然等：《中外政治笑话精萃》[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7、姜列青：《俄罗斯笑话与幽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8、方成：《红旗下的幽默》[M]，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

9、方成：《幽默艺术》[M]，北京：商务印刷馆，2009年。

10、[德]鲁道夫•赫尔佐克著，卞德清、林笳、王霹译：《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

11、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3、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

14、[俄]谢尔盖•谢曼诺夫著，孙静萱译：《勃列日涅夫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

15、[苏]梅德维杰夫等著，舟山译：《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16、[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著，杨春华、张道庆译：《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

17、[美]塞维林•比亚勒著，普尔译：《苏联的稳定和变迁》[M]，北京：新华出

版社，1984年。
18、[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张达楠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19、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0、[俄]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
21、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2、[英]以赛亚•伯林著，潘永强、刘北成译：《苏联的心灵》[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23、[法]皮埃尔•阿考斯、[瑞士]皮埃尔•郎契尼克著，郭宏安译：《病夫治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法]皮埃尔•阿考斯、[瑞士]皮埃尔•郎契尼克著，梅辛、刘云虹译：《非常病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苏联]罗伊•亚•麦德维杰夫、诺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著，钱诚译：《谁是疯子》，北京：群众出版社，1979年。
26、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30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27、[俄]O.B.埃德尔曼编，方琼、唐福山译：《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审查（1953—199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28、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九七六年二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29、《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专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30、《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专辑•续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31、《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一集至第十八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2、[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和译：《我的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
33、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4、周尚文、郝宇青：《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35、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6、陆南泉、章础、陈义初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年。
37、陈汉章等译：《苏俄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 年。
3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
3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
4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 年。
41、[美]约翰•P•哈特等著，辽宁大学经济学系翻译组、复旦大学经济系等译：《苏联经济现状：提交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论文汇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年。
42、[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
43、[俄]博尔金著，李永全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
44、[美]罗伯特•唐纳森著，任泉、刘芝田译：《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
45、[俄]尼古拉•津科维奇著，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译：《极端政治——前苏联首脑遇刺秘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
46、[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47、[美] 阿尔蒙德、小鲍威尔著，朱曾汶、林铮译：《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

二、外文参考书目

48、Bruce Adams,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Routledge Curzon,2005.

49、Ben Lewis,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A Political System Almost Laughed Out of Existence,Pegasus Bossks,2009.

50、David Brandenberger,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An Anthology of Unofficial Jokes and Anecdotes,Slavica Publishers,2009.

51、Graham,Seth Benedict,A Culture Analysis of the Russo-Soviet Anecdote,PhD thesis,U. of Pittsburgh,2003.

52、Mark Perakh,Laughing Under The Covers:Russian Oral Jokes,1998.

53、Sheila Fitzpatrick,Everyday Stalinism: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54、Orlando Figes,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Penguin Books,2008.

55、James von Geldern and Richard Stites , Mass Culture in Soviet Russian: Tale,Poems,Songs,Movies,Play and Folkore,1917—1953,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

三、中文报纸、期刊：

56、季讷：《饱含辛酸和愤怒的嘲笑——从一些政治笑话看东欧人民如何痛恨新沙皇》[N]，人民日报 1977 年 6 月 12 日第 6 版。

57、辛田：《苏联政治笑话》[J]，《半月谈》1981 年第 13 期。

58、《美联社报道目前在南流传一些讽刺苏联的政治笑话》[J]，《参考资料•下午版》1980 年第 18008 期。

59、《政治笑话—— “我要到苏联去”》[J]，《北京少年》1978 年第 1 期。

60、盛世良：《苏联政治笑话五则》[J]，《参考消息•上午版》1981 年第 18561 期。

61、余行：《苏联及东欧政治笑话四则》[J]，《当代杂志》1979 年第 1 期。

62、余行：《苏联及东欧政治笑话四则》[J]，《当代杂志》1979 年第 2 期。

63、培柱译：《苏联政治笑话》[J]，《世界知识》1979 年第 6 期。

64、《人民日报》[N]（1969—1988 年）

65、郝宇青：《“勃列日涅夫稳定”原因论》[J]，《历史教学研究》2005 年第 4 期。

66、郭春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与社会的离异》[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2009 年第 2 期。

67、张建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 年第 1 期。

68、唐裕生：《前苏联的反犹政策与犹太移民潮》[J]，《世界民族》1995 年第 1 期。

69、白玉广、宋正著：《试析苏联犹太移民问题的形成及影响》[J]，《史学月刊》2002 年第 4 期。

70、[俄]鲁斯捷姆•瓦西托夫著，李瑞琴译：《从个人崇拜到公民崇敬：列宁在当代俄罗斯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J]，《国外理论动态》2009 年第 8 期。

71、朱岩：《硬汉夏伯阳：战争英雄难逃美人芳心》[J]，《文史博览》2009 年第 7 期。

72、贺红英：《夏伯阳：一种“苏维埃神话模式”的确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9 年第 2 期。

73、刘重庆：《俄罗斯贝阿铁路建设 30 周年》[J]，《世界轨道交通》2004 年第 12 期。

四、英文期刊：

74、Ben Lewis,Hammer &tickle,Prospect Magazine,20th May 2006—Issue 122.

75、Christie Davies,Humour and Protest: Jokes under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007), 52:pp.291-305.

76、Christie Davies,Jokes As The Truth About Soviet Socialism,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Vol.46,2010,pp. 9-32.

77、Arvo Krikmann,Jokes in Soviet Estonia, Folklore: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Vol.43,2009,pp. 43-66.

78、Laineste Liisi,Politics of Joking: Ethnic Jokes and Their Targets in Estonia (1890s–2007)，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lore , Vol. 40, 2008, pp.117-146.

79、James G. Blight and janet M.Lang,FORUM:When Empathy Failed Using Critical

Oral History to Reassess the Collapse of U.S.-Soviet Detente in the Carter-Brezhnev Year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ume12,Number2,Spring 2010,pp.29-71.

80、 Kadi Sarv, Childrens' Political Anecdotes-Register,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ore, Vol. 5,1997,pp.97-171.

81、 Emil Draitser,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ussian and American Humor,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Meta:Translators' Journal, vol. 34,n° 1,1989,pp.88-90.

82、 Emil Draitser, Soviet Underground Jokes as a Means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Summer 1989, 23, 1, pp. 117-125.

83、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The "Anecdote" :Unrationed Soviet Humor,Russian Review,Vol.16,No.3(Jul.,1957),pp.27-34.

84、 I. D. W. Talmadge,The Enjoyment of Laughter In Russia, Russian Review,Vol. 2,NO. 2(Spring,1943),pp.45-51.

85、 William Graves III and Vladimir Karasik,The Russian Anecdot AS Cultural Genre,Discourse AND Performance,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2,Nos. 3/4(Summer/Fall 2009),pp.157-160.

86、 Valerii Tiupa,Communicative Strategy of The Anekdot and The Genesis of Literary Genres,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2,Nos. 3/4(Summer/Fall 2009),pp.161-170.

87、 Elena Shmeleva and Alexei Shmelev,Evolution of A Speech Genre: The Case of Russian Canned Jokes(Anekdoty),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2,Nos. 3/4(Summer/Fall 2009),pp.171-184.

88、 Vadim V. Dementyev,Russian Anekdots of 1970s:On The Material Of The Soviet Humorous Journal "Krokodil",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Nos. 3/4(Summer/Fall 2009),pp.185-198.

89、 Alexander Kozintsev,Stalin Jokes and Humor Theory,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2,Nos. 3/4(Summer/Fall 2009),pp.199-214.

90、 Alexander Kozin, "Krokodil" In Transition:The Case Of Bureaucrat Cartoons,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Nos. 3/4(Summer/Fall 2009),pp.215-233.

91、 Elena Sheygal-Placzek,The World of Politics in The Russian Political Anekdot,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Nos. 3/4 (Summer/Fall 2009),pp.234-249.

92、 Viacheslav B.Kashkin and Ksenia M.Shilikhina,Narrat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Stereotypes:Discursive Functions of Russian Anekdots,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Nos. 3/4 (Summer/Fall 2009),pp.250-266.

93、Maria Yelenevskaya, "Ours Abroad" As A Theme of Humor on Ru.net: Changing Values,Competing Loyalties,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Nos. 3/4 (Summer/Fall 2009),pp.267-287.

94、Vladimir Karasik,New Russians in Anekdots,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2,Nos. 3/4 (Summer/Fall 2009),pp.288-305.

95、Alexei Yurchak,The Cynical Reason of Late Socialism: Power, Pretense,and the Anekdot, Public Culture 1997.9:pp.161-188.

96、Chad Bryant,The Language of Resistance?Czech Jokes and Joke-telling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3-45,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41,No. 1(Jan.,2006),pp.133-151.

97、Sarah Davies, "Anti-Soviet Agit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30's,Cahiers du Monde russe,Vol. 39,No. 1/2,Les annees 30: Nouvelles directions de la recherché (Jan.-Jun.,1998),pp.149-167.

98、Elliott Oring,Risky Bussiness:Political Jokes under Repressive Regimes,Western Folklore,Vol.63,No.3(Summer,2004),pp.209-236.

99、Nikolai Zlobin,Humor as a Political Protest,Demokratizatsiya,1996,pp.223-231.

100、Don L.F.Nilsen,The Social Functions of Political Humor,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990,pp.34-47.

后记

经过近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终于完成了。回想我写毕业论文的历程，尽管忙忙碌碌，但最终还是倍感欣慰。往事如烟，我的毕业论文完成的时候，也是我即将结束研究生学习阶段，离开华师大的时候。此时此刻的这一个深夜，我思绪了好久，想了好多这三年来发生的事情，心中顿生一丝复杂的情怀。想来想去，最终心境还是落到不舍得这三字上。

忘不了，我十分敬重的导师——郝宇青老师。我的毕业论文从选题、写作、修改直至最后的完成阶段都是在恩师的点拨之下逐步完成的。恩师多次细心地对我指导毕业论文，每次都使我烦躁的思绪重新激出新的火花。从我步入华师大以来，我就一直深受恩师的熏陶，恩师的学术氛围使我很有感触和启发，慢慢地我开始发自内心地喜欢苏联史，而且也越来越喜欢对苏联的兴衰进行思考。恩师还在生活上、就业上都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总之，在此我向恩师表达我由衷的崇敬之情和感恩之情。忘不了，敬爱的范军老师、杨烨老师、卿文辉老师、张丽君老师，您们渊博的知识、敬业的精神、和蔼的面孔，都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底。当然，我的同班同学们，三年来一起走过的欢声笑语，我更是忘不了。除此之外，我在此对我的父母和我的女朋友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对我的包容和付出。

三年的研究生时光即将过去了，我好想在深夜中大声疾呼，我爱华师大，我爱上海，我舍不得离开你们。将来的事情我不知会是怎样，但我深知，这三年的光阴将在我的生命中永驻。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深夜零点四十分于上海